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讯

第5期（总第327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7年5月5日

-
- ◆ 开门红的启迪·····相重扬(1)
 - ◆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郭书田(2)
 - ◆ 坚定文化自信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丁玉华(10)
 -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对外合作交往新形势·····朱丕荣(16)
 - ◆ 领悟孙中山振兴中华伟大思想·····张蓝水(23)
 - ◆ 关于生态正义问题初探·····孙万鹏(26)
 - ◆ 粗劣秸秆是怎样变成高蛋白优质饲料的·····李毓堂(33)
 - ◆ 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成功之路·····揭益寿(37)
 - ◆ 运用“互联网+”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缪建平(39)
 - ◆ 施平老人家给我的一封信·····蒋谐音(43)
 - ◆ 浅谈政府和创新活动中的思维更新·····孟焕民(45)

开门红的启迪

相重扬

新华每日电讯 2016、2017 两年在一月初连续报导江西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给种稻农民发年终奖金的消息。

在高库存、高进口、高成本的压力下，如何使粮农增产增收，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保证粮食安全，是大家关心的事。

凌继河连续六年给种粮农民发年终奖，从 2010 年的 56 万增加到 2016 年的 308 万。这几年获得高奖的农民，去年年终奖 20 多万，今年 30 多万，欢欢喜喜。种粮一定吃亏？凌继河提供了一个范例。

2010 年凌继河将流转来的 19000 亩农田，分别让种粮能手管理。种粮能手每月预领工资，规定每亩产量，超产有奖，年终算总账；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便于农机服务；农资统一经营，保质量、降成本；建碾米加工厂，建品牌，开专卖店，供产销一体化，增加收益。今年春节前十天销售额达 18 万元。除了自己流转的土地，还接受周围种粮大户的委托，提供农资、农机，销售等托管服务。托管服务的面积，2016 年达 3 万亩，年终也发奖。

概括起来，凌继河的做法是：调结构、选良种、产优质米；种粮能手规模经营技术到位；平整土地，耕耙播收水烘干等一条龙农机作业；供产加销全程服务，降成本保质量增值；优质优价超产者奖激励机制。这些做法的关键是强化市场意识，只要大米好，价格高一点也有人买，凌继河曾告诉消费者，他的大米“有点贵”但有人来买。

凌继河的范例给人的启迪：

一、顺应人们由吃饱到吃好，能吃好的需求，选良种，出好米，注重大米品质，质量与产量并重。即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种植思维，进一步落实粮食供给服从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提高的要求，重视质量，质量与产量并重的种植思路，保障人口众多的我国粮食安全。

二、农业能手规模经营技术到位。农田是靠人去耕耘的，靠有知识、有经验、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才能落实技术措施，种出量高质优的庄稼。有规模经营才能产生规模效应，避免小而散的弱势。

这启示我们培训农民不仅是书本知识、信息技术，更重要的是有坚持、不怕吃苦、实干的精神，熟能生巧，实践出真知，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种田能手。即便使用程控技术控制的设施农业，也要经过实践才能成为操作能手。因此培训农民要有一定时期在先进的农场（合作社）轮岗实践。这是必不可少的。农业有地区性，接受培训的单位必须是当地的农业示范基地。农民经过培训回乡后，培训和推广单位应继续保持联系，相互促进交流，

共同推动农业生产。

三、有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单独或联合，产加销一体化综合经营，增产、增值、增效。

凌继河将流转的农田虽然分别由种田能手管理，但实际统一经营，降低成本；建加工厂，开专卖店出售自产优质米。由一个生产水稻的经营实体，发展成加工、销售的企业，增加附加值，农民得利。碾米厂副产物还可发展养殖业，优质大米如与餐饮业结合收益会更多。

四、公开透明的激励机制。凌继河与种粮能手规定每亩产量，超产有奖，双季稻每亩产量 1500 斤，再生稻 1300 斤，如每亩超产 1-50 斤每斤奖 0.5 元，超过 50 斤-100 斤，每斤奖 1 元，超过 100 斤以上的每斤奖 1.3 元，鼓励积极性。

凌继河的先进事迹鼓舞人心，新华每日电讯誉为“新农人”。科技是提升品质的基础，几篇报导中均未介绍选用品种名称、选育和推广的单位，这些有待继续关注。

五、两点建议：

1. 开展优质稻米评比活动，提倡米食文化。先从县开始，逐步扩展全省，有条件时进行全国性的评比。评比要注明种植农户、品种名称、育种单位、品质分析以及米饭品尝等指标。优质米进行拍卖。优胜者得奖，科研和推广单位应分享成果。

2. 政府扶持。在县的范围内有计划地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立农业合作社，修建基础设施、烘干设备，加工厂，小型仓库等，以利于综合经营，活络农村经济。

（作者：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本文写于 2017 年 2 月）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形势的重大变化

郭书田

- 农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重大突破
- 股份合作制的典型案例
- 赋予农民集体经济财产权的重大意义
- 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对策建议

● 结语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与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创造的经验，展望十九大后的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胜利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的任务，走进了“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有了良好的开端。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方针，继续发布了有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五个一号文件，以及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相关配套文件，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措施，使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农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一）农业持续发展，粮食产量稳步增加。2012年至2016年，粮食总产量由5.46亿吨增加为6.16亿吨，在人口增加2970万的情况下，人均产量由407公斤上升为446公斤。总产量连续增加，后一年产量略有下降（0.8%）。

（二）农民收入逐年提高。2012年至201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917元增加为12363元。前四年的增长率高于GDP年增长率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后一年略低于城镇增长率（0.6%）。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有所缩小。2012年至2016年，由3.1:1下降为2.7:1，下降0.4，年均下降0.08。

（四）贫困人口明显减少。2012年至2016年，在现行标准下，由7000万人减为2000万人，年均减少1000多万人。

（五）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有所加强。社会保障事业有较大发展。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向普及高中教育迈进。农业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养老金基本覆盖全国农村，标准逐步提高，初步建立起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保制度。

（六）农村与农业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生态农业有较大发展，开始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等安全率达90%以上。水土流失、荒漠化、面源污染以及成灾面积有所减少。

（七）农业现代化水平有所提高。2015年，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63%，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6%，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耕地承包面积的33%。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开始走上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道路。

（八）农村产业结构逐步优化。2010年至2015年，一二三产业的比重由34.6%、39.7%、25.7%调整为25.6%、45.4%、29.0%。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与流通业的发展迅速，比重大幅上升。2015年农产品加工业创造利润534亿元，缴纳税金268亿元，开始走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农业专业户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兼营户约占总户数的30%左右，以非农专业户与以非农业为主的第二兼营户约占总户的70%左右。

（九）农村劳动力结构与家庭收入结构有很大变化。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高达2.7亿，成为城市建筑与服务业的主力军，城镇化率达到57%，为城镇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近年来进城农民工有所减少，就地“农转非”

的增加，有助促进小城镇建设；返乡第二次创业的农民工有所增加（五年内达到 450 万人）。农村家庭收入结构：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大幅上升，已超过经营性收入，达 52%。随着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推进，财产性收入开始增加。在东部地区，股份合作社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 10%以上。

（十）农村的生产总值逐年上升。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为 10%，第二产业上升为 23%，第三产业上升为 12%，合计为 45%，处于近“半壁河山”的地位。在调整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经济的发展已转向拉动内需为主，居民消费的增长率农村达 10%以上，高于城市一倍左右。农村文化消费大幅上升，2015 年休闲农业接待游客 22 亿人次，创收 4400 亿元。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重大突破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路线指引下，农民以极大的勇气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了土地包干到户的家庭经营，异军兴起的乡镇企业，民主政治的村民自治，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回顾这些改革，在实践中可以看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突出的是农村集体所有资产农民主体地位虚化问题。

农村集体所有资产包括土地（含耕地、草地、林地，约为 100 亿亩），与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含工、商、建、运、服）等，是中国农民拥有的最大资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关系九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但作为集体所有的农民一直处于虚化状态，不仅在经济上成为贫穷的重要根源，也是国民经济最大的短板，而且在政治上也丧失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影响社会安定与党的执政地位。中央多次提出要探索农村集体所有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但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与体制的障碍，使这个重大问题成为困惑不解的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这个决定最大亮点是触及到困惑 50 多年来难题的要害。

为了落实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定，2015 年 9 月，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在全国 29 个县（区、市）试点，在东西南北中不同类型区域取得可操作的经验，收到了显著的成效。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着力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

201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有关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提出，“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根本地位。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必须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不能虚置。土地集体所有权人对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强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不能虚置”。

股份合作制是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县罗村镇建立了第一个股份合作社，浙江省黄岩县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发布支持股份合作的地方法规，农业部颁布了第一个《农村股份合作条例》，中国农业大学王立诚教授编著了第一部《农村股份合作社论》，随后各地在艰难中陆续发展起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有了快速的发展。迄止 2015 年底，全国有 5.9 万个村和 7.1 万个组，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分别占总数的 9.7%和 1.4%。2017 年拟新扩大 100 个县（市、区）试点。

股份合作制的典型案例

从实践上看，可喜的是有一些地区创造出好的典型，能够增强解决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问题的信心与决心。

浙江省是个人多地少的小省，人均耕地只有 0.5 亩，不仅在生态环境治理上走在全国的前列，还在 2015 年消灭了绝对贫困，使贫困人口人均收入达到 4600 元，超过全国现行脱贫标准的 1 倍，达到了国际标准。在 2015 年，全省完成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起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核心的股份合作制，使农民成为有产者的股东，增加了财产性收入，提高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真正成为能够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主人。为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为真正实现均等化，缩小城乡差别，有了显著的进展。2015 年，全省常住人口 5508 万；GDP 达到 4288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人均 77861 元（11978 美元）；财政收入 4810 亿元，增长 7.8%；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43714 元，农村人均收入 21125 元，收入差为 2:1，均走在全国前列。

温州市是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实行股份合作的发源地之一，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被称之为“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建立起来的龙港镇，被称为“天下农民第一城”。开始被人指责为资本主义典型，后又被斥之为“非驴非马”与“不伦不类”。而他们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自动联合起来，组建股份合作社，统一产品名称、商标、质量标准、银行开户、注册登记，戴上了“红帽子”成为“集体经济”。随后，由于快速发展，形成企业集团。目前全市 99.8%的村实行股份合作制，量化集体资产 170 亿元，持股社员 690 万人。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一个村从集体资产股中出资 300 万元，建立基金互助社，在满足社员需求的同时，投放利息达 120 万元，股权增值 40%。

江苏省农村集体企业发达，源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公社与生产大队的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后，易名为乡镇企业，均为集体所有的企业，被称之为“苏南模式”。在推行股份合作制以后，与“温州模式”形成两种模式“殊途同归”。江苏省昆山市，是知名的中国第一县，位居百强县榜首。总面积 931 平方公里，24%为水面，常住人口 165 万。2015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080 亿元，人均 18.6 万元（2.86 万美元），财政收入 800 亿元，上交国家 400 亿元。进出口总额 834 亿美元，其中出口 518 亿美。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755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749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3623 元，是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 21966 元的 2 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10772 元的 3 倍。通过推行土地等集体经济的股份合作，把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 61.8%，财产性收入约占总收入的 10.26%，是全国平均的 3 倍。农业从业人员，只占总人口的 1%，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1.5:1。

上海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2011 年，上海市委、市人委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列为重点调研课题，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若干意见》与《关于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的若干意见》。到 2016 年上半年，上海完成了集体经济产权改革的村 1547 个，占总数的 92%，17 个镇全部完成了产权改革，涉及村与镇两级成员 500 万人。2015 年度，有 110 万人分享红利超过 1.2

亿元，人均 1025 元，户均 4100 元。上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镇、村、组三级，全部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闵行区有 137 个村完成改革，占总数的 96%。2015 年全区农村集体资产净值 18 亿元，镇级收支平衡，村级 17 亿元，组级 1 亿元；分红总额 4.4 亿元，人均 3764 元；村民入股率由 70% 上升到 90% 以上。经过改革，理清与落实了自 1956 年以来 29 万成员农龄与 75 亿的股份占有权与收益权，壮大了集体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批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 亿元的大村，其中有 10 亿、50 亿、100 亿以上的富裕村，最高的是江苏省的华西村，是知名的中国第一村，是最早由村民投资入股的股份合作社。本村村民 5000 人，经济总收入曾达到 500 亿元（2015 年为 480 亿元），人均收入 1000 万元（153 万美元）。为提高产品竞争力，2013—2015 年投入技改资金 8.87 亿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2015 年接待游客近 200 万人次，服务业利润贡献高达 65%。每年投入 8000 万元，带动周边 13 个村发展致富，缩小差距，每年投资 1.1 亿元，与新疆、西藏、宁夏、贵州等地区的一些村建立扶贫致富的合作关系。随着外来员工增多，在企业内部的工资与奖金，一律同工同酬，按劳分配。这里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很小。吴仁宝老书记的继承人吴协恩，传承并发展老书记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法宝，作为治村创新的思想理念。

这些典型在全国虽然是少数，但展示了股份合作的良好前景，相信有了星星之火，就会产生燎原之势。

赋予农民集体经济财产权的重大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每届三中全会都要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在中国农村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包括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回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行政手段推行“全盘集体化”以及二战后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农村实行使农民丧失财产权与主体地位的“集体化”，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标志，成为束缚思想的“禁区”，实践证明是缺乏生命力而不成功的。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及“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 卷 812 页），“只剥夺剥夺者的生产资料，不对非剥夺者实行剥夺”（《共产党宣言》），“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 卷 264 页），“‘用圈地运动’和‘羊吃人’的暴力，使农民与土地分离成为工人，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编年史的”（同上，23 卷 737 页），“把小农的私人财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能以强力手段剥夺，不论有无补偿，而是依靠示范与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424 页）等主要论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中国农村继土地改革与家庭承包经营两次革命性的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革命，是“还权于民”的重大举措，是对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失误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矫正，是集体所有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一句话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宗旨的真实体现。

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经漫长的路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在大陆实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时是“私有私营”。不久，不失时机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建立了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是“公有私营”。接着，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土地变为集体所有，标志着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时是“公有公营”。时隔不久，在“大跃进”中，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把土地、劳力、农具、牲畜四固定到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时是更大范围的“公有公营”，持续了20年之久。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创造了土地集体所有与承包经营分离的土地包干到户（家庭承包经营），使人民公社解体，这时是“公有私营”，形成“超小型农户经济”。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到四中全会决定中的“一个不许，一个不要”（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到中央的75号文件的“可以也可以”（在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随后，包干到户（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势如破竹在大陆各地发展起来，成为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承包经营权由15年不变到30年不变，再到永远不变与长期不变，给农民吃了怕变的“定心丸”，而这个变革只限于经营权，未能涉及所有权，是“半截子”改革，成为一个重大短板。

从农村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实质是产权问题，产权问题的要害是所有权问题，所有权的关键是虚置问题，即农民主体地位虚化问题。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的由来。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完成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全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农村方面为全盘集体化与消灭私有制），提出过渡时期（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工业化）“三改”（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至1956年，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标志着“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58年在“大跃进”中建立了“政社合一”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流传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颁布了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土地一直为生产队农民集体所有，极少数（如大寨）因规模甚小，实行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但是，有些地方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农村土地所有制三个过渡的设想（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由生产大队向人民公社过渡，由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人民公社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过渡），制定了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与人民公社过渡的计划。北京市在郊区选择了10个人民公社，进行了全民所有制的试点，由此引发了农民的不安，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1970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坚持“四固定”在生产队的人民公社条例，制止了“穷过渡”现象。农民的宅基地一直为农民所有，1972年修改人民公社条例时变为集体所有。这项制度从1958年至1978年坚持了20年。土地包产到户，一直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禁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奋起突破这个禁区，由包产到户发展为包干到户，使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与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分离，发挥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人民公社解体，农民存在“谈合作色变”的心理，有些地方出现无经济组织的“空壳村”，先后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表述为：农村土地除国有外，为乡村农民集体所有，由农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增加了村民委员会，成为土地承包的发包方，一直持续至今。

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的弊端是：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把村民委员会作为行使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因村民委员会相当于生产大队（行政村），村民小组相当于生产队（自然村），产生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把集体所有权的范围无形中由生产队扩大为生产大队（犯了曾经制止了的“穷过渡”错误）。目前村民委员会占 40%，村民小组占 60%。二是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社会组织，并非集体经济组织，引发了行使集体所有土地与经营管理的混乱。在实践中，不少地方的村民委员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行使部分政权职能，形成新的政社不分、以政代社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垄断一级市场（用行政手段以低的价格强行征用土地），又经营二级市场（以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获得巨额差价收益，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地生财”，成为常态。据财政部统计，自 1999 年至 2015 年土地出让金高达 27 万亿元，最高的 2014 年为 4.2 万亿元，这是又一次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剥夺。一方面使土地大量流失“农转非”，另一方面农民严重受害，引起农民不满，上访农民多为土地财产权受损问题，还成为一些乡村干部腐败的温床，出现“小官巨腐”，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基础，是社会不安的危险之源。这项制度困惑多年而得不到解决的障碍，一是意识形态；二是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对策建议

首先要从认识上划清确立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地位与私有化的界限，扫除心理障碍，明确界定集体所有制的本质内涵及成员的权利。在中国，农民拥有最大财产是他们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共同拥有的农村土地，包括耕地、草地、林地等，农民是这些共同拥有财产的主体。它与私有化有本质区别。应该讲，农民穷就穷在未能使这笔财产权实体化。农民创造的家庭承包经营，只解决经营权问题，而未能触及所有权落实问题。不能以为有了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自治组织就落实了集体所有权，关键要落实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财产权及其产生的经济利益问题。根据各地的实践经验，对这项改革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改革目标：消除农村土地所有权农民主体虚化问题，使农民成为真正有财产权的成员。把股份制与合作制统一起来，把所有权与承包权统一起来，农民既是集体经济组织（也称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又是股东，也就是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不仅能够有财产性收入，还能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知情话语权，决策参与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管理人员选择权，民主监督权。实践证明，土地股份合作制是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与劳动者利益紧密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是“自人的联合体（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中国化的有益实践。

二、行使集体所有土地经营管理权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可命名为“土地股份合作社”，而非村民自治组织，做到政社分开。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范围在确定地权时，原则上仍应维持原生产队（村民小组），已经扩展为生产大队（村民委员会）的，农民要求改变的，应尊重农民的意愿与选择，不能以行政手段任意扩大范围。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农业部门主管、注册、登记，授予法人地位，依法管理，并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集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均为用益物权，应受《物权法》保护。在合作社内部，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健全社员（股东）代表大会以及选举产生的理事（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机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土地股份合作社法》。深化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实行“价补分离”政策，政府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

的补贴，主要用于从事粮食生产的股份合作社与农民。

三、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股东）资格界定，确权不确地。按照尊重历史与照顾现实的原则，社员（股东）以户为单位，以改革开放后实行土地包干到户的“户”为依据，确定社员（股东）资格。在确权中，将地权变为股权，以家庭承包经营时的地亩为依据，折成股权，仍坚持“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方针，依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经营权的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建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与流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实现产供销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并与农民形成紧密型利益共同体，使农民通过股权分享土地的增值效益，增加财产性收入。要使土地资本变为金融资本，消除农民不愿意转包甚至收包的心理及对土地的留恋与依赖性，免除惜地的后顾之忧。切实改变土地细碎化、分散化、小型化以及抛荒撂荒与地力下降的局面。

四、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变为市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目前已有 2.7 亿农民工在城镇务工经商，形成一支新型产业大军。但他们的户籍仍为农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中央决定在“十三五”期间，先解决 1 亿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超过经营性收入，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而速度与规模将有所减缓。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进城农民工不因进城而取消或改变其土地所有者身份，这自然会出现一批“土地与工商业兼营户”的家庭。不论哪种经营结构，涉及农民重大利益的土地财产权是不能侵犯的。

五、下决心转变一身二任的政府职能，让市场在土地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即放开一级市场，退出二级市场，土地价格由市场形成，属公益性建设用地，由政府买单。也就是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扭转“以地生财”的局面。政府收取的耕地占用税，用于耕地的“占补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为填补农业短板，增加财政金融的投入，大幅提高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向农业倾斜，特别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的投入，提高抗御自然灾害与市场竞争能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城乡居民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

六、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基层党的组织要加强党的建设，把依法维护与保障农民的财产权作为一项重大任务。也就是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真贯彻执行。严格贯彻执行中央从严治党与加强党内监督的“准则”与“条例”，支部书记要以身作则，成为表率。尊重与支持村民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四大民主”，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严格党政分开，支部不得包办代替，使之成为全球拥有最多弘扬中华文化的自治群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净化党内与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结语

一些领导同志常说，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幸福乐园就没有全国的幸福乐园。农业强则国家强，农村美则国家美，农民富则国家富，这是很有道理又非常重要的。

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在总结十八大以来的成就与经验基础上，确定今后的任务。按照既定至 2020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 2010 年的基础上 GDP 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按现行标准（年收入不低于 2300 元）全部脱贫三项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农民的收入由于基数小（5919 元），翻一番为 11838 元，已于 2016 年提前实现（2016 年为 12363 元）。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2016 年为 2.72：1）与区域之间收入差（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差约为 10：1）过大仍居历史高位问题尚未解决，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增加老乡（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是关键，脱贫标准有待与国际接轨。为此建议提出具体目标：即到 2020 年城乡差别，作为第一步降到 2.0：1 以下。这样，每年就要在比前四年平均缩小 0.08 的基础上翻一番，即达到 0.16。增加农民收入，除了经营性与工资性收入外，重点放在财产性收入。农民穷不是由于资源禀赋不足，虽然由于人口多及人均占有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总量是富裕的，而在于体制与机制的缺陷。实行股份合作制，是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农村的股份合作制，是农民又一个伟大创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公有制形式。把股份制与合作制两种优势融为一体，把劳动、土地、资本生产力三要素融为一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能产生巨大的正能量，把资源优势转为经济优势，使农业大国变为农业强国，创造出新的辉煌。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敢于进入深水区啃硬骨头，求实创新，为缩小城乡差别与区域差别，实现社会和谐，阔步前进，做出新贡献。

（作者：农业部原政法司司长，本文写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文所用数字引自农业部《2016 年农业发展报告》与国家统计局《2016 年公报》）

坚定文化自信 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丁玉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他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复兴的深厚底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行、繁荣发展的精神依托。新形势下，无论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需要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努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文化品格，提升民族复兴的精气神，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而共同努力。

一、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建立在深厚的文化积淀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发展的结晶，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思想文化的独特贡献，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推进理论创新的深厚沃土。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开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后来到西汉时候，司马谈把它概括为 6 家，以后又有人把它概括为 10 家，还有的说 100 家、189 家，但最重要的是 3 家。在这 3 家里面，儒家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学术体系、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道家提供了一个自然主义的传统。可以说《周易》，就是《易经》，它是把人文主义传统跟自然主义传统结合起来，这两个传统奠定了整个中华古代文化的基本走向，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两个传统的影响和作用。中华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它是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哲学、伦理、文学等。根据哲学的观点，文化最根本的东西是哲学，因为哲学是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问题，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当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就文化形态来说，以上提到有儒家、道家。在汉代，在西汉末东汉初，印度的佛教传到了中国内地。印度佛教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来说，是个异质文化。佛教要进来，当然遇到很多阻力、很多障碍。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基督教从唐朝就传到了中国，但它没有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佛教是融到了传统文化里面了。后来有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儒释道，释就是佛教，儒道佛 3 家是传统文化的 3 大组成部分。那么佛教之所以能够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自然主义传统虽然符合了中国人的需要，但是它还有缺陷，那就是说对人生的烦恼、痛苦，特别是人的死亡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探讨的很少。大家都知道，人如果没有死亡，人生就没有意义，生与死是相联系、相对应的，没有死亡，就不用探讨人生的理想意义的问题。正因为有死亡，我们要探讨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来确定自己的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方面，可以说佛教恰恰弥补了中华文化的缺陷，它起到了补充作用，所以说佛教给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解脱主义的传统。解脱主义，就是解脱烦恼、痛苦，解脱生死问题，这也是适应中国人民的需要的。所以说我们传统文化由儒释道 3 家所组成。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有没有一些稳定的、恒定的、具有永久意义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一个时期、一个朝代、一段历史，而且适用了所有的历史时间段；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北京人，也适用于广东人；不仅适用于中国人，其实也适用于全世界的人。因为凡是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价值，都必然具有普世的意义。举例：

“诚信”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理念，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朋友有信”。在《论语》和《孟子》里面，“信”被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诚”的概念，除了《论语》《孟子》讲，《中庸》《大学》讲得更集中。《中庸》和《大学》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相传《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大学》是孔子的高足曾子所作，所以两书大量引用孔子

的原话。《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把“诚”视为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从“正心诚意”开始。作为一个人，内有诚，外而才有信，“诚信”是连在一起的。诚信是道德的基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基因，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诚信”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不讲诚信。

“恕道”是孔子的思想。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提出一个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没有一个观念一个人一生都应该践行？孔子说有，这个观念就是“恕”，宽恕的恕。它的义涵孔子也有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的至高的价值理念。这个价值理念规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人与人相处，应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不希望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人。

宋代的思想家，对“恕”的解释有一些很好的比喻。为了做到恕，甚至可以“易子而抱”，就是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来培养自己“恕”这种道德理念。“恕”这个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的博大胸怀的体现，证明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种异量之美，能够同情他人，尊重他人，宽恕他人。西方对孔子的“恕”的思想评价很高，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属于全世界的道德金律。

二、王岐山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过程

在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同志在参加青海代表团讨论时指出，青海是三江之源，黄河、长江养育了中华民族，孕育出 5000 年绵延不断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中华民族自古就延续着自己的文化血脉，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最终都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过程。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决定了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是西方的道路，这不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人不自信，谁人信之。我们的自信来自于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思考。希望青海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既要让群众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又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好养育中华民族的源头活水。（引自 2017 年 3 月 7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同志在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最早明确提出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还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强调：“必须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有两种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一是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思潮。前者在革命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到建设时期，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 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还会进一步地中国化，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儒学也会继续向现代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可能永远不会结束。

我们期待着这两股思潮能够合流，即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机融合，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这种有机融合是中国文化大舞台上的有机融合。

有人提问，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儒家学说的精神之间有哪些主要的相近和相通之处？颜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斗争，儒家强调和谐，这一点是不同的。但抛开斗争之外，其他部分有相通之处。①追求的目标相通。儒家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②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儒家追求以民为本，民者，人也。其实民就是人，人也就是民。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实现，概括起来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③全球性视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具有全球性或者世界性的视野。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解放自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不是某一国的，强调国际性。儒家文化也是全球性、世界性的，它认为所谓的“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儒家把整个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是相通的。

作家王蒙认为，为什么中国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西方基督教的思想，在客观上是性恶论，它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所以它的很多制度是从人的自私心、贪欲、原罪出发设计的。但是，马克思认为人性是向善的，人的自私心是私有财产所造成的，人本来并不自私，而是这种不合理的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了人的自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社会、私有财产社会是人类的史前时期，人类真正的文明史还没开始，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才能称之为人类文明史。孔子的许多想法是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的愿景相衔接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人不但爱自己的父母，也以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人的父母；不但要爱自己的子女，也用同样的心情照顾天下的孤儿。所以，孔子学说里面包含有对人类社会美好生活前景的积极愿望。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思想里边的民本思想、统一战线的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艰苦奋斗的思想、团结一致的思想、顾全大局的思想、军民一致的思想，尤其是拒绝腐化、拒绝糖衣炮弹的思想，都具有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今天谈传统文化，就是要让传统文化接受新文化的洗礼，让传统文化和以毛泽东、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统一起来，结合起来。按习近平同志的说法，就是要使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的转变与创造性的发展。

三、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述

在张维为教授书中提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崇拜中国儒家的学说。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思想。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茨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提出了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在莱布尼茨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中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认为中国在实践中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中国与欧洲可以相互补充，组成一种世界文化。

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伏尔泰非常认可孔子的学说，他在《哲学辞典》中提出了“常识不平常”“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作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

教或对宗教的借喻。”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写后易名为《中国孤儿》。他借剧中的人物来推崇中国的习俗和道德标准。

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也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方法论》一书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国启蒙时代的“百代全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高度评价四书五经等中国儒学经典。他认为，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认为从 16、17 世纪开始，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理儒学传入了欧洲，影响了包括笛卡尔在内的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武器。

欧洲启蒙思想家还发现中国不实行欧洲的贵族分封制度(封建制度)，所以国家无需向贵族特权势力妥协，从而可以“不搞偏见地”统治。对于靠本事而不是靠世袭的科举制度，他们都非常敬重。经济上也是一样，自由主义者的偶像就是中国。人们把亚当·斯密当做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亚当·斯密的背后是法国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魁奈（1694—1774），魁奈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魁奈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他所强调的农业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在 18 世纪法国思想界和经济理论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13 年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中国时表示：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存在了四千年以上，而且现在仍然生机勃勃，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都已成过眼云烟，拉丁美洲文明也已经逝去，可是中国还在。

日本名士的遗憾：

1924 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的演讲中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是科学文明，并最终发展为武力文明来压迫亚洲国家，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霸道”文化。而东方文明则是要远远超越它的“王道”文化。王道文化的本质就是道德和仁义。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拥有亚洲的王道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未来，日本究竟是要成为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都需要由你们日本国民自己去详审慎择。

后来的情况如何呢？七十年之后，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到中国天津演讲，他在引述了孙中山上面这段话后坦陈：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不仅没听从孙中山的这一忠告，反而一发不可收地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对话稻盛和夫》四第 85 页）

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教科书中，对于中国的评价有不少是积极的，给予应有的肯定的。比如，俄罗斯大学前教育 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世界文明史》里边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传播的延续性，这真是个奇迹。”它还说，“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大的断裂，但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古代中国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总是在本民族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盲目地吸收外来经验，”“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特殊的文化。”“中国人追求自我完善，很有责任感，所以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非常发达。”德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德国通史》里边说，“早在公元十三世纪，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和贸易中心，”“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及火药发明为首的众多发明对世界历史和科技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德国小学 5

年级的一个历史课本里边讲，中国的纸的发明比火药的发明“更加具有造福人类的意义。”美国、印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都有类似的论述。

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

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深入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只有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才能魂有定所，行有依归，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关键是要一手抓文化培育、一手抓融入法治，使二者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从而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五、全国“两会”热议坚定文化自信

《人民日报》大字标题《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自信》。理由一：发展创造中国奇迹。二：世界分享中国方案。三：百姓见证中国进步。四：文化提升中国魅力。中国两会，对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今年，来采访的外国记者增至 1500 多名。英国《卫报》这样报道，“两会不再单纯地关乎中国的国内事务，它具有全球影响力，对全球事务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今年两会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引发代表委员共鸣。在他们看来，如今的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从容和自信，对话世界、融入世界。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政协举行记者会，5 位委员就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对于“世界更喜欢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认为，世界需要真实的、多元的中国题材。他举例，意大利著名歌剧《图兰朵》，主要音乐素材来自于中国民间小调《茉莉花》，演出后一鸣惊人，制造了非常强烈的“中国震撼。”

近年来，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到《成语大会》，再到《中国诗词大会》，这些优秀的文化综艺节目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一个个有时代创意又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节目，如同一股文化清流，触动无数观众对“诗和远方”的美好遐想，以及心中深藏的中华传统文化情结。

这些文化类的节目走红，并非偶然。物质文明日益丰富，人们自然会寻求精神的富足，而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

典藏，为我们心灵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牧场。诗词歌赋、文牍书信、君子品格、天下情怀、崇德向善等，十几亿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文化追求，两会代表委员热议文化中国，正体现这种期待。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海霞认为，“很多人越来越多地关注我们的中国文化，喜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一个大宝库，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不断地从中国文化中挖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東西，去传承好它。”

对于更多的国外电影引进中国，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表示：“这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但这个压力是好的。压力令我们电影人更努力、拍更好的电影。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有近 14 亿人的努力和支持，我们的电影和传统文化肯定能走出去。”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我们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不只是知识，文化是让我们享受的，特别是好的传统文化。怎么让孩子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感受到热爱、幸福，是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的。要不断创新方式，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大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热爱过程中提高他们的修养。”全国政协常委苏士澍说：“从小学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作者：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局长。本文写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对外合作交往新形势

朱丕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提出治国、治党一系列新的理念、思想、决策，领导发动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勤奋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满怀信心，胜利前进。

在对外开放方面，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针，推进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和谐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共同实施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框架，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和支持，树立了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大国，也是国际农产品贸易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农村脱贫，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好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建设的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平等互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扩大农业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为增进国际友谊，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建

设，推进世界农业进步，为消除饥饿贫困和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有益贡献。

一、农业对外开放的新特点

目前，我国与全球 150 多个国家建立了农业合作往来关系，与 60 多个国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农业合作机制，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等国际农业机构，以及更多的区域性、专业性多边组织建立了农业合作机制。近年来，农业对外交往活动和合作项目更多，更大，更前瞻，更有效，更活跃。

1、参与区域性多边组织农业活动与部长级高层交往增多，向多极化发展。中国与拉美、中日韩，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欧盟，中国与中东欧，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都举行过部长级会议。双边方面，与美国、加、德、俄、澳、新西兰、丹麦、乌克兰、芬兰、意大利、缅甸、阿根廷、巴西、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马耳他、纳米比亚等国进行部长级互访，有利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合作。我国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处升格为大使级，由副部长级担任代表，以利推动三方联合，扩大“南南”农业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建设。

2、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发展境外农业合作。2013 年制定“境外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发展规划”，2014 年加强农业对外合作的组织协调，成立了由农业部牵头，与发改委、财政、商务、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国家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制定“2016—2020 年农业对外合作规划”与措施，加大政策扶持、投资，支持企业走出去，平等互利，合作开发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兴办农业产业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实体。

3、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援助。在原有援非和“南南”合作的基础上，扩大援外的范围与资金投入。2014 年李克强总理访非，2015 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大会，都宣布我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在农业计划方面，积极支持受援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技术进步和帮助培训农业科技管理人才等内容。

4、加强农业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我国与一些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联合成立农业实验室、研究中心等科研机体，取长补短，确定重点，发挥智慧，着重科技创新的建设，共同研究，成果共享，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5、中国农业国际声誉提高，对全球农业治理有了更多话语权。中国被联合国誉为“过去 30 年间发展最快的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表扬中国，被授予完成世界粮食首脑会议“2015 年贫困营养不良人口减少一半目标”的证书，成为国际农业扶贫发展的典范。中国主持召开世界农业展望大会和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等多次大型高层次重要会议，发表宣言，传播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立场观点，有利扩大国际影响力，引领全球农业治理体系新发展。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已达 11 个之多，居世界之首，有利树立中国农业历史悠久、有优良传统的国际威望。

二、农业对外合作的进展和成果

1、扩大对外投资，创办境外农业企业，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我国远洋渔业首先走出去，1985 年 3 月就组织中国水产集团派 73 艘渔船、230 多名员工，去非洲合作捕鱼，双方获利，效益良好。之后逐步扩展规模

和经营范围，带动我国农业走出去创业，有利于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现在，我国境外农业已扩展到 80 多个国家与地区，遍及全球五大洲。有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集体和民营企业等单位，也有沿海一带农民，闯出去开办蔬菜等小农场，供应当地市场消费。涉及从事粮食、大豆、饲料、饲草、油料、棉花、糖料，果蔬园艺产品，养猪、养禽、养兔、养牛，牛奶、水产、橡胶、油棕、剑麻、油橄榄，农产品加工，奶粉、葡萄酒等产业，以及农业机械、兽药、农药，沼气工程等领域。有的还建立农业开发区，产供销一体化实力正在不断壮大。

在党的十八大重视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引下，2013 年农业部制定了“2013—2020 年境外农业资源和开发发展规划”，积极支持中机美诺公司牵头，成立了中国境外农业开发产业联盟，鼓励推动企业强强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走出去产业链。2014 年国家建立了以农业部牵头，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等参加的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制定政策措施，加强领导，推进农业对外合作事业。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给予贷款支持，采取国家支持，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政府服务为保障，围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在更大范围领域和更高层次上，组织参与重点产业和区域的农业对外投资合作。2016 年农业部又制定了“2016—2020 年农业对外合作规划”。在中国农科院，成立了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并建立农业对外合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成立了全球农业大数据与信息服务业联盟，启动对外合作企业信用评价；征集重点项目信息，还举办了 8 个培训班，培训 600 多人次，成功启动农业对外合作“猎鹰”行动计划，有 60 多家知名大中型农业走出去企业参与，创建了农业对外合作人才培训基地。据商务部统计资料：农业企业对外投资（存量）：2004 年 8.34 亿美元，2010 年 26.12 亿美元，2013 年底，境外农业企业达 379 家，投资存量 37.13 亿美元，遍及 71 个国家，解决东道国 9 万多人就业，缴纳税费 10.9 亿美元。2015 年底统计，境外农业企业达 1300 多家，对外农业投资存量 117.4 亿美元，扩展到 85 个国家。仅中国进出口银行已向 90 个农业对外合作项目贷款 230 亿元人民币。2016 年中国水产在伊朗，将计划投资 200 亿元人民币，开发西亚、非洲渔业合作，将派 60 多艘渔船进入红海、波斯湾从事捕捞生产。阿里巴巴集团马云企业家，也在法国投资 8900 万元人民币，收购波尔多地区的两座葡萄酒庄。2016 年统计，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已达 185 个，共计 156 亿元人民币。

我国农业战线已培育了一批对外投资合作的骨干企业，如中国水产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公司、中国农垦发展集团公司等，特别是中国粮食集团公司，已收购了全球两个大粮商（荷兰基尼德拉集团和新加坡来宝公司）股权，这是农业领域对外投资的最大项目，到 2020 年该公司海外营业收入将占到 60%以上，海外粮源掌控量超过 5000 万吨，第三国贸易量超过 8000 万吨，总经营量达 2 亿吨，成为国家粮食进出口战略的国家队。还有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如黑龙江农垦集团、云南农垦集团、广东农垦公司等；集体民营企业有伊利奶业、双汇食品、光明食品集团、蒙牛奶业等，逐步发展壮大我国农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能力。

2、扩大农业对外援助。我国从 80 年代起就倡导“南南”农业技术合作，通过双边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技术援助，以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专家、提供咨询、技术指导、培训人才等方式，积极帮助他们提高农业生产力。2008—2013 年间，我国向非洲国家援建近 30 个农

业技术示范中心，派出专家千名以上，来华培训 3000 多人。1996 年和 2014 年，我国分别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赠 3000 万美元+5000 万美元的信托基金，支持执行粮食安全计划。到 2013 年，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向非洲 24 个国家实施 20 多个项目，派出一批专家进行技术援助，取得良好成效，深受受援国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好评。2014 年，我国决定向非洲提供“现代化合作计划”，援助 600 亿美元，其中将建立 100 多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派出 30 批农业专家组赴非洲，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制，帮助推进非洲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在肯尼亚内罗毕农业科技大学，援建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中方提供配套研究设备和研究经费，并派出 30 多名专家，从事玉米、高粱、小麦、水稻、猕猴桃、葡萄等研究与技术示范，同时培养非洲各国农业高级技术人才（硕士、博士生）。这个中心，对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贝宁等国也起到有益的作用。2014 年李克强总理访非，宣布支持非洲实施农业优质高产示范工程，在 5 年内，为非洲培训 1000 名农技管理人员。

2014 年，我国向上海合作组织捐赠 5000 万美元，用于成员国农技推广和人员培训；向东盟国家提供 700 多万美元无偿援助，推行农业技术促进项目，支持农作物育种、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人员培训，内容包括气候变化、作物育种、蔬菜生产、养殖业、农业机械与实用技术等；组织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水稻迁飞害虫防控项目。还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签订了加强消除全球饥饿及促进发展伙伴关系的备忘录，要在华举办“南南”合作培训农技与管理人员，推广实用技术和管理经验。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要为最贫困国家提供 20 亿美元发展援助，并为最贫穷国家免除债务，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力争到 2030 年达到 120 亿美元。其中提到在减贫、农业合作、促进贸易、生态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医疗、教育等 6 个方面，各建 100 个项目；接受发展中国家来华培训 12 万人，给奖学金名额 15 万个，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50 万名。还筹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由此，农业援外任务繁重，农业部门需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共同发展多做贡献。

据商务部资料，到 2015 年底，我国农业援外完成 270 多个项目，派出 1 万多人次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在当地培训 18 万多名农业技术人员，在华培训 4 万多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提供大量农业机械、良种、化肥等生产物资。还相继对外进行粮食援助，仅 2016 年就为非洲 14 个国家提供紧急粮援助达 7 亿多元人民币，累计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饥饿人口近 1 亿人。2016 年 10 月，菲律宾总统访华，商定了“中菲 2017—2019 年农业合作行动计划”，将支援菲律宾农业发展。

3、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我国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大国。1978 年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只有 61 亿美元，1989 年达 200 多亿美元，1995 年超过 300 亿美元，2007 年达 781 亿美元，2010 年达 1845.6 亿美元。2004 年前是农产品贸易顺差国，出口大于进口；2004 年开始变为逆差国，当年逆差 11.3 亿美元，2013 年逆差 510.4 亿美元，2015 年逆差 462 亿美元。近年来，由于国内市场需求增长，国际粮豆价格低于国内市场，有利增加储备，进口谷物与大豆数量较多。如 2015 年谷物、大豆进口 1.3 亿吨，2016 年进口 1.05 亿吨。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农产品进口的第二大国，农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五位。

特点是：出口密集型产品，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有利缓解我国水土资源紧缺的压力，保障主要农产品有

效供应。蔬菜、水果和水产品是三大主要出口优势产品。2015 年蔬菜出口 1018 万吨，水果出口 450.3 万吨，水产品出口 406 万吨。苹果汁、罗非鱼和大蒜出口稳居世界首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品牌、质量等优势逐步增长。

我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确保我国农业利益在早期谈判中不受损害，维护我国在农产品关税配额管理体制，以粮食安全为目标的农业补贴等政策调控空间，也推动发达国家成员取消出口补贴等贸易措施。在中瑞、中韩、中日韩、中澳等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打掉外方不合理要求，为我产业发展争取最大利益。2016 年在中美磋商中，对进口大豆加强实施杂质检测的要求，打掉美方在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禽流感解禁方面的不合理要求，有效把控美国牛肉入华的节奏，敦促美方在水产品可追溯规定方面作出调整。与商务部合作，对进口食糖采取保障措施，对干玉米酒糟、白羽肉鸡、马铃薯淀粉等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或保证金，以抑制这些产品进口。

近年来，农业部积极支持与组织中央与地方有关单位赴境外参加国际农业展览，参加国际贸易促进会举办的各种博览会、农业食品展览会，并通过农业经贸合作论坛、洽谈会等，积极向国外开展优势农产品营销、促销、推介等活动，宣传与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声誉，树立国际良好形象。同时不断支持优质农产品出口基地和品牌示范的建设，并举办农业经贸管理人才培训，推进农产品出口创汇。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创汇农业，与乡镇企业和国营农场密切相关。据商务部统计，1979—2010 年农林牧渔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 600 多家，投资约 15 亿美元。2012 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882 家，投资 20.62 亿美元，2014 年 719 家，投资 15.22 亿美元，到 2014 年底累计有 2.3 万多家，投资 782.63 亿美元。2016 年为 538 家，投资 123.3 亿美元，投资规模有所扩大。其中一半以上投资来自港澳台地区。

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包括非农产品）2011—2013 年 15 万多家企业，每年稳定在 4.3 万—4.5 万亿人民币。农垦部门 2014 年出口供货商品总额为 944.84 亿元人民币。

4、开展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引进来，走出去，取长补短，创新与推广先进技术，投资小，收效大，有利实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目标，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世界农业技术进步与共同发展。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2012 年为 52%，2016 年达 56%。不可否认，引进国外农业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与装备是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目前，生产上应用的农作物优良品种，有一半是从国外引进或利用引进的种质资源育成的。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如地膜覆盖、设施农业、高效低毒农药、复合肥料、配方施肥、农业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机械化养鸡、人工授精、配合饲料、秸秆氮化饲料、节水灌溉、网箱养鱼、养奶牛业、农产品保鲜加工等，得到广泛应用，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1996 年起，通过国家“948 引进国际先进农业技术计划”的实施，引进种质资源品种 2 万多份，先进技术 240 多项，仪器设备 120 多台套，向 40 多个国家派出 400 多名专家，从 30 多个国家请进 40 多名专家。评估结果表明，农业科技研发时间平均缩短 10—15 年，节约研发经费 30%—50%，这是一项很有成效的举措。

近年来，着重通过多边、双边合作，建立了许多农业实验室、研究中心，针对重点课题，有计划地开展合作研究，成果共享。这是技术创新机制，有利发挥智力作用。仅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原

子能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中心等，以及双边政府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与农业研究中心，已有 70 多个。如中美生物防治研究室与南美白对虾技术交流，英国洛桑研究所三个联合实验室，中德农业中心建立沼气研究中心，中欧盟在环保、生物技术合作创新，中丹（麦）进行畜牧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建立乳品技术合作中心，中荷（兰）加强马铃薯种苗商品薯生产技术合作，中芬（兰）进行奶品、燕麦、农机、生物质能源研究，中匈（牙利）农业科技合作促进中心，引进大樱桃良种合作研究，中瑞（典）引进燕麦品种与加工合作研究，中波（兰）农技中心引进良种黑猪与兽医合作研究，中加（拿大）对草原管理、奶牛、油菜等进行科研合作，中澳（大利亚）、中新（西兰）在畜牧、奶牛、动物检疫、防治疫病等进行技术合作，中国阿根廷成立食品技术中心，在植物蛋白、肉品加工、骨血利用等合作研究。国际家畜研究所在华建立反刍动物疫病防控联合实验室，世界农用林研究中心与我合建农用林业与可持续畜牧业联合实验室，2016 年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在北京新建亚太研究中心。

中国农科院还在国外建立一些合作研究机构，如在巴西、古巴都成立了联合的农业研究中心；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在瑞士合作建立欧洲实验室，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物病虫害防治研究。

一些涉农企业也在国内外进行技术开发推广工作。如瑞士先正达、德国拜尔、法国科马格兰等在华进行植保和育种的研发工作。拜尔、雀巢公司在黑龙江省建立奶牛培训中心，传授寄生虫控制、健康、环境卫生等技术。美国杜邦公司在湖南推广农作物无公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示范。先锋公司在河北省建立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广玉米良种和新型种衣剂、病虫害防治技术。百事食品公司在宁夏建立薯片加工型马铃薯科技示范基地。2015 年，美国常青藤联盟名校与一些著名农业高校科研单位，在中国与伊利集团合作建立中美食品智慧谷，积极协助中方培训技术人才。我国的伊利集团也在新西兰与林肯大学合作进行乳制品营养与安全技术研究，在荷兰与瓦赫宁根大学共建伊利欧洲研发中心。飞鹤乳业公司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在波士顿成立营养实验室，合作研究婴儿和成人的营养需求。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全球环境基金会近年支持中国进行动物疫病防控、食品质量安全和农业废弃物利用、农村能源等方面技术合作。

我国农业技术具有一定优势，也向国外传授、推广，为世界农业技术进步做贡献。如独特的优良品种、杂交稻、种稻、种蔬菜、茶叶、食用菌、橡胶栽培加工、养蚕、养鸡、养鸭、养鱼、生物防治、动物疫苗、马的传染性贫血病防治疫苗、禽流感防治疫苗、沼气工程、太阳能利用、中小型农机具等，在国外试验推广，深受各国欢迎采纳。如禽流感疫苗，开拓亚非市场，出口销售。近年还向国外推荐一些新的技术成果，如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创新的“阿太灵”生物农药，能有效提高植物免疫力，控制病害发生，促进根系生长，安全、环保、无残留，在亚洲、美洲 8 个国家试验推广。福建农林大学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的菌草及食用菌栽培技术，已在 10 多个国家示范推广，并为 90 多个国家培训了 5000 多名学员。2015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古巴，将辣木种子作为礼物赠送他们试种。辣木是新的热带作物，营养丰富，也可药用，有抗癌、消炎、抗氧化的保健作用。

为了培养提高我国农业科技人才素质，请进来与派出去相结合，学习国外农业先进技术知识与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据 1978—2014 年不完全统计，我国农业派出留学生、访问学者以及到国外短期培训人才达 1.4 万

多人次。请进专家（指导、咨询、讲学）3 万多人次，有效地增强了我国农业科技队伍和创新能力。

5、积极参与农业国际事务，发挥建设性作用。国际机构与地区性多边组织农业论坛日益增多，关注着发展农业，保障粮食食品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贫困营养不良人口，发展农产品贸易，保护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战略问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与欧盟、中东欧，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拉美、二十国集团等相继召开高层次农业部长会议，以及全球农业科学院院长会议，很多在中国召开。我国利用承办主持国地位，安排议题，发表宣言，阐述中国的主张与观点，也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引领全球粮食治理体系新发展。如在昆明召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农业部长会议暨国际农业经贸合作论坛，发表了“昆明共同宣言”，宣扬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和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获得各方的赞同和响应。在西安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有副部长级以上 44 人和四个国家农业组织的第一把手参加，由我东道国设置议题，磋商主导权推进会议，并创新有部长、科学家、企业家三位一体的开会方式，取得了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突出了中国绿色发展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三大国际农业机构的集体响应和支持。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把粮食安全纳入重要领域，并要实现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的机制化。2013 年，我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发达国家），联合在北京召开世界农业展望大会，发布“2013—2020 年农业展望”报告，专章介绍中国农业，提升我国农业对全球农业信息的影响力。

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植保公约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及 8 个区域性渔业组织等，常要商讨规章制度、协议，并制定标准细则等事务，带动辐射的效应很强，必须认真应对，力求维护国家利益，遵守国际秩序。如参加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磋商，将“茼虫威”列入农药评估优先列表，启动“茼虫威”在茶叶中的最高限量制定进程，促进我国茶叶出口。出席国际植保公约第 8 届缔约方大会，成功地推进谷物国际运输标准的制定，要求粮食出口国加强检疫管理。

2013 年起，我国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视，促进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我国率先制定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并申报了一批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迄今已有 11 个项目获联合国粮农组织批准，居世界首位。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受到国际赞扬。

以上这些活动，展示了中国农业软实力的增长，有利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地位与声誉。

三、迎接新的挑战

我国和平崛起，处于新兴市场国家地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今受到某些发达国家的挑衅、发难、打压、遏制。加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但是总的趋势向好，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执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示赞同共识，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多作贡献，共建和平、美好、繁荣、和谐的新世界。

农业是改善民众生活的大事，众所关注。解决农村贫困和营养不良人口，确保粮食安全，发展科技经济，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仍是国际社会进步的重要议题。我国是负责任大国，农业外事面临的任务，既要认真落

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对外工作的部署与决策，在全球农业治理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力所能及地推进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促进世界农业技术进步，同时也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作出应有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基础还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与科学技术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农业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短板和低谷，急需赶上。洋为中用，需要虚心学习借鉴吸收国际农业先进技术、知识与经验。建议国家继续制定类似的“948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计划”的新的计划，以利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新的能量和动力，不断奋力前进。

（作者：农业部原外事司长，教授级高级农艺师，曾任 1989—199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委委员。本文写于 2017 年 3 月）

领悟孙中山振兴中华伟大思想

——纪念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

张蓝水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2016 年恰逢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回顾孙中山“振兴中华”伟大思想和实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考察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和实践，本文重点关注三个关节点：上书改良社会、发动武装革命、规划建国方略。具体地说：1894 年孙中山递交深怀改革之志的《上李鸿章书》；上书失败，奋而创立“兴中会”，立誓“振兴中华”，采取革命手段，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1917~1919 年规划、编制《建国方略》，对“新中国”改革、发展进行顶层设计。

—

1894 年 6 月，孙中山规划并奉上一份国家改革蓝图，即“为生民请命”的《上李鸿章书》。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未理睬这篇寄托孙中山政治抱负的雄文。

《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文献。面临欧美工业革命即机器革命对人类带来的巨大变革和社会进步，孙中山痛感清王朝的衰败和昏庸，立志用机器改造中国社会，在中国掀起一场欧美式的工业革命，是上书的核心思想。

《上书》开宗明义：“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是孙中山对欧洲社会变革进行透彻分析，向朝廷提出的“富强-治国”社会改革纲领。

1. “人能尽其才”是国富的根基。孙中山提出：“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人既尽其才，则百事具举”。孙中山从教养、鼓励、任使三方面提出“人尽其才”的环境，是非常全面、正确的人才观。国家要办教育，使人有受教养之所；要有鼓励政策，使优者有所获益；要有公正的用人法规，使人才公平地各得其所。

2. “地能尽其利”即振兴农业问题。孙中山提出“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孙中山强调“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农业是国家“重中之重”。

“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是孙中山对我国农业的至理名言，点明了农业机器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特征。“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中国农业要跟上世界前进步伐，一定要引进、制造、发展自己的机器工业，在农业领域广泛使用机器劳作。

3. 关于“物能尽其用”，孙中山说：“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灵笨与人力之勤惰”。孙中山所指物能尽其用，重“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以机器开矿、治河，兴办工业，使大地之宝藏为民造福。他提出“机器巧，则百艺兴”强调机器对物尽其用、对富国的重要性。孙中山告之，要国富民强，必须“推广机器”，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

孙中山提出“物用愈求则人力愈省，将来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矣”人类现今的机械化、自动化正在向之迈进。孙中山提出科学设想：“将来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则生五谷，长万物……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120年后的今天，遍布城乡的智能温室、无土栽培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现实。

4. 对于“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强调商业的重要性：“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流通引导生产，有时甚至比生产本身还重要。孙中山指出：“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碍，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强调机器特别是运载车船的重要作用。

关于火车、轮船、轮车对“贸易繁兴”的作用，孙中山说：“此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可见，机器是“货流”之载体、命脉。其中，他特别强调火车对国家的重要地位，指出“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结论是“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

上书中有一段话写得特别令人动情：“夫商贾逐什一之利，别父母，离乡井，多为饥寒所驱，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也。”孙中山分析得入骨三分。这使我们想到如今一些农民外出经商打工的艰难情景。

总结这四大纲领，孙中山说：“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结论是：“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中国落后于欧洲，只有“举此四大纲领而举国行之”才能加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达到经济繁荣、民富国强。这四个方面做好了，就能修政治军，巩固国防，赶上欧洲先进国家。

《上李鸿章书》提出这四大纲领，是他心目中美好社会的蓝图，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每项纲领都贯穿着工业革命这个核心。

二

清廷对这份上书的漠视，特别是甲午战争清廷的战败，成为封建专制制度走向溃败的总暴露，使孙中山对清廷改良的祈望彻底破灭。清王朝已无可挽救，只能用武装革命的手段推翻之，以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孙中山从此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表达了革命志士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忧虑和愤慨：中国积弱，非一日矣！近之辱国丧师，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有志之士，能无抚膺！章程第一条和誓词表达了兴中会的意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和“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决心。这是孙中山用文字明确竖起“振兴中华”的大旗。

从此，兴中会着手发动武装革命，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此，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彻底推翻了延续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三

中华民国建立后，为加快中华振兴步伐，孙中山于1917~1919年对国家发展进行完善、细致的规划和设计，对1894年改革纲领进行全面深化、拓展、细化，形成民主共和时代新篇章《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是中华民国创立者孙中山所说的“吾欲建设新中国之总计划”，是孙中山亲手规划的20世纪振兴中华详尽的宏伟蓝图，是一部对中国全方位顶层设计的鸿篇巨制，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中一座史无前例的里程碑。

《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大部分组成，分别论述“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阐述建设名副其实共和国的理论和规划。本文从“振兴中华”角度，重点关注《实业计划》的“物质建设”内容。

在《实业计划》“篇首”中，孙中山提出“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公共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这是在新条件下，气势恢弘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纲领。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在中国各经济领域，包括农业、采矿、工厂、运输，以及一切公共事业，都要“废手工采机器”，是20世纪初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工业革命。

《实业计划》分为6个计划。其中1~4可概括为中国国土开发计划，包括运河、海港、渔港、铁路建设规划，人口分布，煤矿、铁矿开采与炼钢工业，湖泊、江河治理，河运、商埠建设，水泥、汽车制造，等等。其详细到每一条铁路、每一条航线的走向规划。

《实业计划》的5~6是工业开发计划。孙中山说：“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发展工业就是在生产领域广泛使用机器的革命，即工业革命。

孙中山把“第五计划”规划为：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印刷等5类工业。在“粮食工业”中，孙中山分别论述了食物的生产、贮藏、运输、加工、保存、流通等。讲到“食物之生产”，孙中山提出“以黄豆代肉类，是中国人之发明。”他说：“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此同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农业领域的工业革命，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等同增加农地，意义重大。

在“衣服工业”部分分别论述了丝、麻、棉、毛、皮各类工业。指出“蚕桑为中国所发明”这使人想到自古通往欧洲的陆地和海洋丝绸之路。

在“居室工业”部分指出“当谋建筑材料之生产、运输、分配，建屋既毕，尚须谋屋中之家具装置，是皆包括于居室工业之内。”把家具制造归之于居室工业，是对家具性质的明确产业定位。

在“行动工业”中，孙中山提出：“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尚须供给廉价燃料，否则人民不能用之”。这里，孙中山提出了汽车产业的基本方针：要造各种类车，要用者买得起，要人民用得起，要开发中国油矿等，于今仍具重大指导意义。

对“印刷工业”，孙中山指出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者“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世界各民族文明进步，常常以年出版量衡量就是明证。

“第六计划”是对矿藏资源工业的规划，包括铁矿、煤矿、油矿、铜矿、特种矿采取及加工业等。孙中山深刻阐述了矿业与机器的辩证关系：“矿业与农业为工业上供给原料之主要源泉也，矿业产原料以供机器，犹农业产食物以供人类。故机器者实为近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又为工业之根”“总而言之，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机器是近代工业之树的理念，揭示了工业革命的精髓。

在“第六计划”结论中，孙中山强调：“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总述六大计划，孙中山说：“前之六大计划，为吾欲建设新中国之总计划之一部分耳。”“建设新中国”是孙中山把“振兴中华”思想升华到新阶段的奋斗目标。

四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曲折，辉煌蓝图《上李鸿章书》《建国方略》长时期被束之高阁。只有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振兴中华“建设新中国之总计划”，才备全了实施条件。新中国着手建设机器制造业，工业化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实施有步骤的“五年计划”已经进入第13个“五年规划”。如今，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方略作为国家的宝贵财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理论能量，发挥着它耀眼的历史光芒。

（作者：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关于生态正义问题初探

孙万鹏

社会正义论研究集大成者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①

生态正义 (Ecology Justice) 是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在人和自然关系中的“闯户外拓”。⁽²⁾

一、我国生态非正义的表现

研究表明,所谓生态危机既是一个环保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目前,我国的生态平衡与环保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正义现象,应该“动若重规,静若迭矩”⁽³⁾,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 关于城乡非正义的表现

在我国,正如郭书田同志多次揭示的那样:中国农民既是牺牲最大、贡献最大的群体,至今还是最大的弱势群体⁽⁴⁾,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中。在抗日战争年代死伤的3600万人中,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子弟兵;在我国实行工业化初期,依靠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工业提供了9494亿元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卫星上天的条件;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依靠农民勒紧裤带,保证了城市居民的基本口粮,同时还接纳了1000万城市知青;在改革开放后,以农村为突破口,农民以极为顽强的精神,冒着极大的风险,闯开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开创了一条新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道路,成为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被一位外国元首称之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子武器”;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村民委员会实行“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被美国前总统卡特称之为在中国农民找到了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诀窍;在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种地,被美国《时代》杂志在年终封面刊载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人物时,选载了四名青年农民工照片,向他们表示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做出重要贡献予以致敬。在我国计划2020年实现小康,解决贫困人口7000万人中,基本上都为农村人口,标准是2300元,即日消费不低于1美元,如按国际日消费1.9美元标准计算,贫困人口还要增加近一倍,201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仍高达2.73:1;“与经济收入差距一样,我国污染防治投资也存在着城乡差距,此项几乎全部投到城市。我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的环境改善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市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环境污染。”⁽⁵⁾

(二) 关于区域非正义的表现

据田启波等研究,就我国而言,区域非正义主要表现为东西部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不协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西部地区主要承接资源开发型产业,加工主导型产业则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国家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环境保护的要求,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财富源源不断地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这样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受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制约,中国资源富足的欠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⁶⁾研究指出,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发达地区。说明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区域非正义现象显而易见,尽管国家提出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但是并没有得到落实。此外,区域非正义还表现在水域上下游的环保责任与利益分配不协调,如上游地区乱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引起河流断流,结果下游地区“栗

栗危惧”，或者上游地区将工业污水直接排到河流中，严重影响下游地区群众的生活用水。

还值得指出的是，多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业由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虽然带动了产业承接地区经济的“发扬岩穴”，但是也转移了发达地区的生态危机，无疑，这也是区域环境非正义的表现。

（三）关于阶层非正义的表现

所谓阶层非正义，是指社会各个阶层制造的环境风险与其承担的环境责任不对等。陆学艺同志生前所著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将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做了界定。⁽⁷⁾王刘玉同志在其基础上，又提出了三大阶层的理论：一是主体阶层：含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与商服员工阶层；二是新生阶层：含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阶层、外企管理技术人员阶层、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与私营企业者阶层；三是过渡阶层：含城乡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离）退休职工阶层与防卫阶层群体（军人群体和公安武警群体阶层）。⁽⁸⁾

在上述诸多阶层中，有的阶层制造了更多环境风险，从中获得了利益却没有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那些相对弱勢的阶层承担了强势阶层所制造的这些环境风险。

研究表明，阶层非正义起源于阶层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导致贫富分化，富人拥有大量资源，也有能力去消耗更多的环境资源，自然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而穷人占有的社会资源远低于富人，消耗的环境资源相对较少，对环境造成污染少，却最终成为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简而言之，阶层非正义往往表现为富人得到的环境利益远远大于穷人，承担的环境风险却远远小于穷人。⁽⁹⁾

二、生态正义的内涵、理论、原则

各种生态非正义的存在，无不昭示着对生态正义“不畏强御”的诉求。然而，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正义的内涵、理论维度及基本原则，仍存在不同看法与争议。

（一）关于生态正义的内涵分析

应该说，生态正义概念的提出和环境正义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密不可分”。然而，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正义本身的内涵来看，正义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与司法的公正。因此，生态正义的应有之义包含平等的生态地位、对等的生态权益以及合理的生态补偿。

1. 平等的生态地位。在生态正义看来，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应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界的每一个物种既具有基本的工具价值，也具有“独行踽踽”的内在价值。人们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让自然界为我所用，但不能盲目凌驾于自然之上，更不能肆意掠夺和剥削自然。

2. 对等的生态权益。生态正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平等权利，同时也应承担尊重自然、保护其“独立而不可侵犯的地位或身份”的平等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超越于不同民族，超越于不同意识形态

以及超越不同的社会地位。当然，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绝对性，使得生态正义的实现需要法律的“江淮之保障”。

⁽¹⁰⁾需要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有效建构并贯彻实施公平的经济运行体系、公正的生态保护体系、对等的生态权利体系以及生态义务体系。

3. 合理的生态补偿。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实现人和自然之间和谐共处以及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功德利益，生态补偿机制采取市场和政策手段来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谓“自益名功德，益他名利益”。

⁽¹¹⁾按照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要努力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总量增长、经济发展与生态容量之间的关系，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的。

（二）关于生态正义的理论维度

一般而言，生态正义的理论维度，可从种际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三个方面来“以详考察”。其中种际维度从物种的角度分析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时间维度从纵深的角度探讨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空间维度则从横向的角度阐述国内正义和国际正义问题。⁽¹²⁾

1. 生态正义的种际维度。随着人类文明和道德情怀的发展，用于处理人类内部的正义原则被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于是形成了生态种际正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首先，人类具有享用自然的权利。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一样，人类需要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自身生存的能量和物质，满足自身的需要。其次，人类应当承担呵护自然的义务。正如帕莫尔所说：“人类不仅是自然的改造者，也是自然的管理者。人类应当担负起自然管理的责任，以维护和发展自然，使之向着有利的方向演进。”⁽¹³⁾

最后，人类要尊重自然的道德权利。要把道德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土地、水域和其他自然的实体，并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¹⁴⁾实际上，生态正义还包括种际同一性正义与种际差异性正义。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2. 生态正义的时间维度。生态正义是以“代”为标准的，有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之分。一是生态代内正义。在学术界，有的强调代内正义是“同代人之间的公正和睦相处”，有的认为，代内正义主要是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代内正义包括国内代内正义和世界代内正义。要保证代际正义，就要努力避免并尽可能减少代内正义。二是生态代际正义。代际正义是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可分为：在场各代之间的公平与在场各代和后代之间的公平。一般而言，代际正义是一种关怀性的理论诉求，它要求当代人在谋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应关照并合理安排后代人的利益与权利，做到资源与财富的可持续发展。⁽¹⁵⁾

3. 生态正义的空间维度。包括国内生态正义与世界生态正义。

国内生态正义是指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在生态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上要实现公平正义。其存在多个层面。例如，众多化工厂、制药厂排出的废水流入河中，导致河水污染等直接影响他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的术语，被称为是经济中的“外在性”，它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需要用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干预。通过法律法规政策来约束人们的不自觉行为，落实生态补偿机制，实行环境收费、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生态保险等政策，将外在性问题内部化，才能维护国内各地域、各阶层的生态正义。

世界生态正义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享有平等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利与可持续发展的权利。按照罗尔斯“正

义论”思想，就需要确立世界生态正义原则。

（三）关于生态正义的基本原则

生态正义的基本原则：一般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与公平”应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可分为生态正义的总原则与分原则。

1. 关于生态正义的总原则。可分为生存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人类深刻反思目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任何生命都把保护自己的生成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这是生命世界的原则”。人类不会为了自然界或者其他物种的“持盈保泰”，而断然放弃本物种的基本生存权利。其思想基础：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关系；二是为此必须彻底根除诸如“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义”的等传统观点。应强调顺应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观念，树立尊重自然与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与生存原则的道德责任。

2. 关于生态正义的分原则。一般可分为平等原则、协调原则、环境民主原则与补偿原则。

就平等原则而言，一是提倡人与自然平等；二是提倡人与人平等；三是提倡生物平等。

就协调原则而言，它是指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在作出发展决策时应考虑经济、社会与环境三方面的相互兼容和协调一致。其特征：一是强调发展优先，真正做到从本国基本国情出发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二是强调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均衡和协调。

就环境民主原则而言，重要的是在程序上明确参与决策、享有权利的主体范围，它突破了传统行政管理的主体范围，扩大到了在这些事务的管理上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主体身上。其根本的精神在于“民主”。其目的在于，通过环境民主原则的贯彻来保证对政府的有限监督，有效弥补政府失灵以及政府责任的缺失，从而实现生态正义。

就补偿原则而言，一是对生态环境的直接补偿，对已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整理与修补；二是对在生态保护活动中作出贡献者与利益损失者进行经济补偿。

三、关于生态正义的实现途径

要实现生态正义，既需要科技进步与创新，也需要提高制度保障，又要变革价值观念，这样才能最终“养育一个更多样、复杂和丰富的生物圈，创造一个比伊甸园更美好的人工花园”。⁽¹⁶⁾

（一）关于价值观念的变革

在实现生态正义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将错误的价值观“摒之门外”，实行价值观念的变革。

1. 关于树立生态文明观。为了实现生态正义，我们在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将人的需要绝对化，人应约束自己的“漂论欲海”，⁽¹⁷⁾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存在价值，将人的经济活动限制在维持自然有序发展和动态平衡的范围。同时应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体现节约精神的生态文明观，要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倡导和推行节约的生产方式与节俭生活方式，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瓶颈制约，使生产走出资源短缺困境的生产方式，并实行节俭型消费。

2. 关于树立绿色消费观。这是生态正义在人类消费领域的现实延伸。所谓绿色消费，是生态消费伦理在实

践中的一种表现，从其内涵看，是比现代消费更丰富、更高层次的消费模式。它不仅更符合自然的本性，符合生态要求，也更符合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有助于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是有利于实现代内消费公平。它强调了消费权利与消费义务的对等原则。受益较多的发达国家应通过合理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补偿，以适当的方式“正曲使直”，矫正历史造成的非正义后果。二是有利于实现代际消费公平。比如确定公平储蓄原则：为了紧邻的后代所愿意储存的数量和他们感到对自己的前一代有权要求的数量之间达到平衡。要使人们认识到，那样只追求一个人、一代人的幸福的道德只能导致历史的倒退，只能让我们生活得像一根根的鸡毛或一根根芦苇。

3. 关于树立全球合作观。目前，生态正义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与关注。国际社会为解决地球变暖、疾病增加等，进行不懈的努力，就是很好的例证。一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关键。例如，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和石油资源。二是调适国家主权观，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正义实践。要逐步实现生态问题和主权问题的辩证统一。三是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使国际环境秩序向正义的方向发展。例如，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多层次沟通协调，扩大共同利益。又如，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确定各国对环境破坏应承担的有区别的责任，与应担负的相应义务等。另外，各国都应加强生态道德的学习与教育。

（二）关于制度保障的提高

制度保障是实现生态正义的“蟠木根柢”，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基础与保障作用。具体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1. 关于经济制度的安排。要实现生态正义的经济制度创新体系，包括外部性的内部化、发展循环经济、完善污染者承担责任原则等。一是要经济解决策略。传统的经济理论假设交易只发生在交易双方之间，然而现实生活中，交易是不可能不影响第三者的，如合作方、竞争方。笔者在“灰学的世界三理论”中已有所涉及。事实上，当某个交易产生外部影响时，市场就无法达成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就须引入非市场手段，如管理措施等手段，这就涉及灰理论的非唯一论原理。二是要发展循环经济。它与传统“资源——产品——废弃物排放”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流动模式。三是要完善污染者承担责任原则。污染者应承担污染预防费用、污染控制费用及污染治理费，并承担对遭受其危害地区或人们的赔偿责任。

2. 关于政治制度的支持。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意味着对政治与价值的重新选择。⁽¹⁸⁾强调走向绿色政治。研究表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会使生态不公正现象更加严重。绿色政治可担负起生态时代再造政治的使命，“它的任务是批评和拒绝启蒙计划，并创造一种可选择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将从明显的‘后现代前提’的文化价值特征解体中重建社会”。⁽¹⁹⁾绿色政治的超越与再造至少体现四个方面：超越二元政治，再造整体政治；超越利益政治，再造原则政治；超越权力政治，再造道德政治；超越等级政治，再造生活政治。尤其是只有超越二元政治，才能实现郭书田先生所指出的“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²⁰⁾才会有我国城乡的整体政治。

3. 关于法律制度的构建。在环境立法中确立生态正义原则，是生态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一要完善环境立法：健全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重视程序立法，提高环境法律的可操作性；完善环境立法监督机制。二要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厘清环境执法的目的，提高环境执法的水平；完善生态执法监督机制。三要完善环境司法：强化司法人员素质；对环境损害赔偿实行综合治理。四要强化社会公众环境监督机制：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范围；扩大环境公益诉讼标的范围；建立环境侵权行为法律制度；适当延长诉讼时效；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

（三）关于科技进步与创新

科技进步与创新是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正义的重要路径。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1. 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选择。实践证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有益于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人类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的错误认识与行为，是对生态正义的反动。人类将自然当作可以随意占有、支配的资源库，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根本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恩格斯曾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生态问题包含了科技问题。我们既不能否定其本身蕴含的科学性，也不能否定科学对其干涉，只有增大科技的投入才能解决生态及其正义问题。

2. 实现生态正义的内在要求。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也会一定程度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匮乏，尤其是核技术的滥用，可能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潜在威胁。因此，要建立有效的科技评审机制，创建与科技发展“相应涵达”的科技伦理体系。一是要树立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为主导的生态科技理念：建构生态科技发展的公平观，考虑使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公正地分享，避免造成生态不公；树立生态科技利用公平观，使科技创新能让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避免加深贫富鸿沟；树立生态科技全面发展观，生态科技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体现，也是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要进行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创新生态化：技术创新要为维护生态正义服务；技术创新要有利于维护人的身心健康；技术创新及其成果的运用要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

3. 建立规范的科技评审机制。科技评审是指人们依据适当的评估标准和程序，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或科技开发，与应用项目的多方面价值和影响展开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对该项目的实施资格、实施路径进行审核及决策。

科技评审包含科技评估与科技审核两个基本环节。科技评估通常也称技术评估，其主要内容是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或科技开发与应用项目的价值、可行性进行评估，特别是从科学认知、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与生态影响等方面，展开对科技项目的价值评估。科技审核则是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或科技开发与应用项目的运行条件进行“以详考察”，并核定其是否具备实际实施的资格。犹似《书·舜典》所言，可谓“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

备注：

(1)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1993. P. 78.

(2) 鲍照《河清颂》

(3)《三国志·蜀志·正传》

(4)郭书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载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通讯》,第9期,2016

(5)李培超:《环境正义刍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2005

(6)骆徽、刘雪飞:《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生态正义及其实现》,《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2005

(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王刘玉、高军:《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状及其走势》,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术交流》第6期,2009

(9)薛琥娜、张敏、吴淞:《浅析我国社会存在的阶层环境不正义问题》,《法治与社会》第6期,2010

(10)《新唐书·张巡传》

(11)《法华文句记》

(12)李永华《论生态正义的理论维度》,《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8期,2012

(13) J.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 New York, 1979. P. 200

(14) [美]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侯文惠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5)杨盛军:《道德个体与环境代际主义的实现》,《唐都学刊》第1期,2009

(16) 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第22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17) 温子昇《定国寺碑》

(18) 田启波等著:《生态正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9) David 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57-58

(20) 同(4)

(作者: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本文写于2016年12月14日)

粗劣秸秆是怎样变成高蛋白优质饲料的

——多功能复合菌剂发酵秸秆优化理论与展望

李毓堂

一、秸秆优化饲用的生物技术革命

1、科研挑战不可能,秸秆优变梦成真。人们很早就梦想:如果能把每年产生七八亿吨常被焚烧丢弃的农

作物秸秆变为高营养优质饲草该有多好，为此，人们早就在秸秆饲用中，采用了青贮、微贮、氨化等发酵技术，虽然使秸秆性状与营养成分略有提高，但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秸秆的质量。如今，梦想成真。由河北农大生命科学院教授朱宝成带领的科研团队经十几年的艰努力，研发出秸秆经特种多功能复合菌剂发酵转化为高蛋白饲草的创新技术。

从特种菌种分离筛选研究，菌种密集繁育实验到复合菌剂工厂化生产，从饲用试验、中试养殖到重点农户推广示范，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项技术使秸秆在喷洒一定比例的特种复合菌剂和无机氮（硫酸铵）的发酵过程中，通过菌种降解木质素、纤维素，将无机氮转化为菌丝蛋白，富集益生菌和增加各种基酸含量，最终成为高蛋白、富能量、多营养、易消化的优质饲草，不仅可用于草食家畜，还能饲用于猪禽养殖。并且菌剂具有密度高（每克含 100 亿个芽苞菌）、成本低（发酵 1 千克秸秆的菌费仅五六分钱）、保质期长（3~5 年）等优点。2008 年，此项创新科学技术在由资深微生物学家陈文新院士和卢良恕、任继周、魏春江院士等十一位专家组成的成果鉴定会上，被评为“国际先进水平”。多年来在许多省区试点实际应用中取得显著成果，得到当地农牧民和地方政府的称赞。

2、用科学数据回答质疑。正如许多新生事物问世常遭质疑一样，秸秆多功能复合菌剂发酵优化技术诞生以来，经常有人提出质疑，问题聚焦于：特种菌剂在秸秆发酵中是否真能降解木质素、纤维素？秸秆发酵后的粗蛋白增量是真蛋白还是无机氮的反应，最终无机氮的含量还有多少？在特种菌剂发酵中，原秸秆中含有的益生菌和氨基酸有何变化，对提高秸秆营养成分起何作用，等等。无疑这些关键问题，如不得到科学解答，就不能清除人们的质疑。

对此，河北农大生命科学院微生物学副教授李红亚在《木质素纤维素酶芽苞杆菌的分离筛选及其对秸秆的发酵作用》博士科研论文中，作了解答。科研以玉米秸秆为代表，在特种复合菌剂发酵中，经用现代精密科学仪器测出的数据，显示出以下四大功效：

一是发酵中通过菌种激活增强秸秆中木质素纤维素酶的活力，使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分别降解 31%、19.17%、18.8%，大幅增加可溶性糖和挥发性脂肪酸等能量物质。

二是发酵中通过菌种高效利用无机氮转化为菌丝生物蛋白，使粗蛋白含量由原 4.94%提高到 12.37%，真蛋白达到 10.24%，原加无机氮（硫酸）的残留量仅为 0.0043%，吸收转化率近 100%。

三是特种菌剂发酵营造了有利环境，使秸秆中的益生菌群得到大量繁殖富集。发酵结束时，有益芽苞杆菌含量达到 $2.95 \times 10^8 \text{CFUg}^{-1}$ ，乳酸菌达到 $4.51 \times 10^8 \text{CFUg}^{-1}$ ，酵母菌达到 $1.49 \times 10^8 \text{CFUg}^{-1}$ 。同时，放线菌、霉菌等腐败菌被完全抑制。

四是特种菌剂发酵使秸秆中的氨基酸含量成倍增加。氨基酸总含量提高 100.5%。其中富营养的赖氨酸、蛋氨酸、缬氨酸、苏氨酸、异氨酸、铬氨酸、丙氨酸的增幅都达一倍以上。

以上科学数据，足以诠释答疑，加深了我们对特种菌剂发酵秸秆多功能的理性认识。

二、秸秆优化意义深远

1、秸秆优变意义深，环保兴牧利民生。中央历来提倡对农作物秸秆综合高效利用，然而贯彻落实中由于

缺乏科学有效的核心技术措施，因而进展缓慢，以致秸秆焚烧、养殖业成本高等问题不仅长期存在，且还有加重的趋势。

从国情剖析来看，秸秆焚烧的本质是效益问题，由于秸秆利用价值低，不值钱，农民不珍惜。优良饲草料不能快速发展的本质是条件问题，由于草原退化缺草，农田种草资源有限，人工种草须大量投资却无着落，所以优质饲草不能大幅增产。农牧民收入低的实质是产值问题，由于农畜产品（含秸秆）附加值不能大幅提高，所以财源不旺。由此看来，把资源丰富的秸秆变为高效益的优质饲草料，确是一项切合国情的战略性技术举措，因为：

把秸秆变废为宝，大幅提高利用价值和经济效益，就使农民从实际中珍惜秸秆，主动放弃焚烧。这就从根本上化解了秸秆焚烧问题，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秸秆优化的高蛋白饲草，具有资源广成本低的优势，因而是又好又快大量发展优质饲草的捷径。它同发展人工种植优良牧草相配合，就形成双轮驱动，大大缓解我国饲草料严重短缺依靠大量进口的压力，促进奶牛业、牛羊育肥业、猪业朝着少用粮、高质量、低成本、好效益方向转型升级。

秸秆变为高蛋白饲料，能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以我国农村人均3亩年产1吨秸秆计算，优化后的优质饲草以每吨1000~1200元计，扣除发酵成本，人均收入可增加1000元左右。如能延长产业链到养殖和畜产品加工，收入更会几倍增加。

秸秆优化高蛋白饲草生产+机械化将形成一个新型的规模大、成本低、效益高的绿色优质饲草产业。目前，河北省的一家农机公司（金土地）同中国农机化院合作，已研制出专门用于秸秆特种菌剂发酵生产的移动式流水线机械设备。把秸秆就地收集——切碎加工——喷洒菌剂辅料——装袋青贮——运输贮存等作业组成一条生产线，并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这为企业开辟新型的秸秆优化高蛋白绿色饲草产业创造了条件。

2、政府引领拓广深，兴农济世再创新。研发出好技术，就要关注普及并引领向广度深度拓展。为了推动秸秆多功能复合菌剂发酵优化技术全面实施并向广深发展，建言献策如下：

建议农业部门制定《农作物秸秆特种复合菌剂发酵优化饲草质量分级标准与检验制度》、《农作物秸秆特种复合菌剂发酵优化饲草技术规程与监测制度》，并推动有关检验、检测设备的完善与应用。

建议教育、科技部门继续支持此项科研创新技术向深度广度延伸发展，并培养后续高端人才队伍。因为特种菌剂发酵秸秆这一战略性基础创新技术，还有很大研发潜力应用空间。诸如：深化发现筛选更多的功能菌种，开发更多的高效发酵菌种组合，深化研发菌剂发酵对瓜果蔬菜等特种作物枝藤叶蔓的优化作用与效益，深化研发特种菌发酵对天然草灌乔植物枝条叶秆的优化功能与效益，深化研究不同优化饲草用于不同畜禽养殖效果与最佳配方，以及这些不同因子交叉组合的相互效用等。

建议将这项创新科技列入国家援外农业科技项目。近些年来，印尼、印度等一些国家因秸秆焚烧烟雾波及邻国，引起强烈反应。可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秸秆焚烧严重污染环境问题。如果将特种菌剂发酵秸秆优化技术，援引给发展中国家，定会起到促进生态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环境保护的作用。

（作者：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

附件：

一亩“秸秆”二只羊 农户增收喜洋洋

——秸秆变宝养羊扶贫革命老区采访记

秸秆焚烧是我国环境污染源之一。据近年来科研部门调查，全国每年焚烧的秸秆在1亿吨以上。中央增三令五申禁止秸秆焚烧。然而，由于利用效益低或操作困难、条件限制等原因，秸秆焚烧现象一直屡禁不止。

为引导秸秆科学高效利用，治理秸秆焚烧污染，本刊近几年相继报道了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会名誉主任李毓堂撰写的——介绍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朱宝成率领的团队经过近十年潜心研究创发的秸秆（草类）多功能特种复合菌剂发酵生产高蛋白优质饲草技术（以下简称菌剂发酵技术）的文章。

此项技术是使秸秆变废为宝的研究成果，它突破了以往秸秆饲料的种种禁限，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非常重要。如果把全国上十亿吨的秸秆和草的一部分科学利用起来，每年至少可省出上亿吨的饲用粮，或腾出3亿亩的耕地用作增产粮食作物。这就从根本上化解了人畜争粮矛盾，确保我国粮食持久安全。

那么，这项技术实践情况如何，真的能产生上述作用吗？近日，记者跟随李毓堂到革命老区山西省武乡县进行了实地调研。

多维牧业：用秸秆特种菌剂发酵的优质饲草带动农户养羊脱贫

山西多维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维牧业）是山西省武乡县享有盛誉的用秸秆优化饲草养羊扶贫的一家龙头企业。

来到多维牧业，公司总经理康绍珍首先向记者谈起了菌剂发酵技术，对它的主要作用机理如数家珍。过去当地老乡对秸秆如何处理很发愁，既不让烧，压在地里烂不了，做不成肥料，还使下茬庄稼出不了苗。如今，秸秆经多功能微生物菌剂发酵，通过转化纤维素与吸收利用无机氮，大幅增加挥发性脂肪酸能量物质、菌体真蛋白及消化酶，使秸秆最终转化为能量高、含粗蛋白质12%以上、消化率高的优质饲草。

康绍珍指着羊舍里正大口咀嚼着发酵草的湖羊兴奋地对记者说，秸秆通过菌剂发酵既增加了适口性和营养，又提高了利用率，还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

康绍珍还向记者介绍了“一亩地二只羊”扶贫的概念。武乡县拥有丰的秸秆资源，农户通过2吨秸秆换1吨发酵草的模式，由多维牧业提供饲草。以1亩地平均产1吨秸秆免费换取1000斤优质饲草来计算，就可育成2只羊。按人均3亩地出栏6只羊计算，农户可增收8000元左右。多维牧业正是用“公司+农户”的形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周边农户共同致富。展望未来，康绍珍充满信心地向记者表示，公司争取四年内，使武乡成为全省综合用优化秸秆发酵饲料养殖的示范县，使武乡县养殖户通过优化秸秆养殖建成小康家庭。

县扶贫办：以多维牧业为主导，提升优化秸秆养殖扶贫成效

武乡县地处太行山腹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根据地。当地人民为抗日与解放战争做出过英勇牺牲。为什么现在成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未来又将如何发展？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武乡县扶贫办主任李艳华。

他向记者阐述，武乡地处山区，山多田少、干旱缺水，种粮产量不高，林果常遭灾害掉花，发展养殖又缺少饲草，如今秸秆变优质饲草是个革命。县委县政府正大力发展以多维牧业为主导的“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转变农户养殖方式，创新资金使用机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优化秸秆养殖扶贫的成效，力争用5年的时间，打赢脱贫攻坚战，使武乡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走访养殖户：秸秆菌剂发酵技术大大提高了养殖增收的效益

在蒙蒙细雨中，记者实地走访了黄土山区的当地养殖户。其中一位名叫李晶的农户向记者叙述，以前主要通过自由放牧加补饲的方式养殖本地山羊，饲草利用率不高，养殖周期需要1年，收入也不多。现在主要使用菌剂发酵的优质饲草喂养湖羊，不仅饲草转化率高，养殖周期也缩短为5个月左右，出栏湖羊都在100斤以上，经济效益比过去有大幅提高。同时，李晶兴奋地表示，下一步她准备自己制作菌剂发酵秸秆生产优质饲草，并带动周围农户一起养殖，共同走向小康之路。

据了解，武乡全县去年人均收入不到6000元，脱贫标准人均不到3000元。如果按农户人均三亩地产3吨秸秆计算，经优化养羊出栏6只，仅此一项增收就可超过全县人均收入水平。看来，菌剂发酵技术既可使秸秆利用功效大大提高，又具备成本低、保质期长、操作简便等优点，易于推广普及，且对引导农民珍惜秸秆放弃焚烧起到积极作用。如果进一步倡导将秸秆发酵优化饲草养殖——畜禽粪便制沼——沼气作燃料——沼渣用作肥料连接为系统工程，则使特种菌剂发酵秸秆（草）一举兼有优质饲料、生物燃料、有机肥料三大功能，这正是国家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环境的目标。

（作者：山鸟，系《行业动态》杂志记者。本文转自该刊2016年第10期）

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成功之路

揭益寿

今年的工作会议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上年度工作情况的总结和2017年工作安排的会议，更重要的它还是学习贯彻2017年中央1号文件、把现代农业供给侧改革精神贯彻好、执行好，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力争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迈出更大步伐的动员会、誓师会。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我虽然不能出席这次年度会议了，但是，我十分关注这次会议的召开，十分关注中央1号文件的贯彻执行。2017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后，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连续学习了3遍，越学越感到振奋，越学越感到中国全面发展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不放松，把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应用好、宣传好、推广好，把绿色循环示范园区、基地建设好，把中央2017年1号文件精神落实好。

我对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已近 40 年了。这期间，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民盟河南省委员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与技术促进处，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河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农业厅、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水利局等主持和指导编写单位及张梅颖、石山、相重阳、韩德乾、冯宗炜、蒋有绪、郭书田、林干、丁玉华、朱丕荣、刘连科等老领导、老专家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在全国 14 个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和 30 多个示范园区、基地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我先后编写出版了《绿色产业示范园区专辑》和《中国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理论与实践》、《中国绿色产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创新与农业现代化》、《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等五部专著。五部专著共印刷发行了 8 万余册，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农业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可以说，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民盟中央等主持编写单位，对于《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的出版发行十分重视，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鼓励。

《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 年 12 月第一版)(以下简称“绿色研究”)是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 已被江苏省出版部门评为“苏版好书”。其主要内容与 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精神是完全吻合的。“绿色研究”紧紧围绕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对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和国外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入研究, 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更加完整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影响深远的内涵、更加科学、准确的表述, 深化了可持续理论: “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 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不对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 实现生态文明和代际均衡, 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并围绕可持续发展创新性地提出了绿色循环经济的科学命题, 其科学性在于它吸收了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等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成果, 同时避免了其各自的不足之处。绿色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性, 同时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主要体现在这套理论已经具体化为绿色循环工业、绿色循环农业、绿色循环服务业等生产服务行业和绿色消费领域, 强调全程绿色生产、全程绿色循环。在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方面, 提出了现代农业十化, 即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信息化、商品化、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的发展目标和“八节一降一减一低二提高加循环”即“节地、节种、节肥、节水、节药、节能、节劳、节粮,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减少污染物排放, 发展低碳农业,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经济效益, 将农业生产的废弃物循环利用、重复利用、变废为宝”的操作方向和方法, 以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在一个独立农业经济体内, 实行高度统一的管理模式, 做到“统一繁种、选种、育种、播种、施肥、灌溉、灭虫草、收割、分拣、包装、加工、储藏、运输、销售、废弃物循环利用”等 15 个统一, 同时强调了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运行机制、科学管理、保障措施等, 与中央历来的精神都是一致的, 是推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操作指南和有力抓手, 也是执行好中央 1 号文件的重要参考。

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措施, 是促使中国农业迅速转型的指路明灯和推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强大动力。文件在提出的一些宏观指导意见的同时, 具体在优化产品产业结构, 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和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时, 特别明确地指出: “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水平。坚持质量兴农，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三品一标”认证，推进农产品商标注册便利化，强化品牌保护。引导企业争取国际有机农产品认证，加快提升国内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切实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源头治理，推行农业良好生产规范，推广生产记录台账制度，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使用有关规定。”

“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建立健全化肥农药行业生产监管及产品追溯系统，严格行业准入管理。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加快畜禽粪便集中处理，推动规模化大型沼气健康发展。以县为单位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探索建立可持续运营管理机制。鼓励各地加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支持力度，健全秸秆多元化利用补贴机制。继续开展地膜清洁生产试点示范。推进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创建。”等等，可以说，2017年中央1号文件既宏观又具体，文件中提出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意见，完全印证了《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完全印证了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与出席今天会议的各示范园、基地合作共建工作的正确性，也使我们坚信，我们把发展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示范点工作的突破口、牛鼻子选择在对“三品一标”农产品的认证上和农产品品牌的创建上的正确性，因为这是落实农业标准化安全措施的关键，也是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更是我们示范园、基地发挥示范作用的点睛之处。所以，大家学习了2017年中央1号文件，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认证”问题。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后，大家，包括农促会、农促会研究室，一定要认真学习中央1号文件，认真对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查找我们在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基地合作共建方面的不足，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迎头赶上，要虚心学习金粒麦业和沈丘县卢庄村的成功经验，把示范园区、基地建设好，真正起到示范作用。

同志们：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和广大读者的要求，“绿色研究”到2018年还要再版，届时我们打算将合作共建示范园区、基地新取得的经验编辑进去。我们希望各示范单位奋发图强、努力拼搏，争取今年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以此为中共十九大的顺利召开献一份厚礼，为推动中国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文系揭益寿教授在中管院农经所河南研究室、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三农理论与实践研究室2017年2月工作会议上的书面讲话）

运用“互联网+”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

——关于惠州市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的调研与启示

缪建平

2017年中央一号支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要“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监管体制，强化风险分级管理和属地责任，加大抽检监测力度。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

2017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确定要落实地方尤其是县级政府食品安全责任，加大日常监管，治理农药兽药残留、违法添加等，严防系统性风险。并提出运用“互联网+”等实施智慧监管，让群众饮食无安全之忧。

因此，研究探索如何建设一个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确保农产品食品安全，落实市县级政府食品安全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创新意义。

广东省惠州市近两年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和经验，笔者近日在该市进行了学习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整理如下。

一、运用“互联网+”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创建全程可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

广东省惠州市政府非常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坚持推进标准化生产和严格执法监管两手抓，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体系，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延伸到农业生产基地。近两年惠州市农业局探索创建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追溯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提升农产品质量监管与服务水平，实现覆盖全市各区县农产品质量管理“生产过程可记录、产品流向可跟踪、储运信息可查询、质量问题可追溯”的目标，集“管、防、控”功能于一体，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同时为各级监管部门提供便利的监管统计分析等管理功能。“追溯平台”是推动运用“互联网+”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先进理念的应用，用信息化技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有积极的创新意义。

“追溯平台”集生产记录、检验认证、品牌建设、防伪、物流仓储、大数据分析、GIS位置信息、移动电商、互联网营销等功能于一体，采用一物一码，让每个录入系统的农产品以溯源二维码作为唯一的“身份证”。公众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两个渠道，可以查询到农产品追溯信息、产地信息、产品信息、企业信息、质量检验报告和入驻承诺书等六方面的详细信息。通过互联网面向公众公开全市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的信用等级、溯源企业和产品信息，公众还可以通过GIS地图，一站式查看全市龙头企业、名牌产品、三品一标、检测体系等相关信息。

经过近两年努力，不断加快“追溯平台”建设的推广落地，截至2016年12月底，共监管农业企业1132家（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400家），追溯示范企业56家，登记产品403个，实现可追溯产品160个，使一大批特色农产品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

二、“追溯平台”建设初步取得明显成效

（一）实现了优质品牌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有效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公信力和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得到广大消费者好评。

惠州市用互联网技术助力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用“无形的手”守护“舌尖上的安全”。2016年12月25日《南方日报》报道，部分市民已经逐步养成买菜扫二维码的习惯，查询农产品从田间生产到市场整个链条的信息，特别是注意查对农药、饲料的使用记录和检验报告信息，了解自己购买的产品是否安全。

在广东省和惠州市农业博览会、农产品交易会 and 品牌农产品推介会等各类展会上，惠州市组织参展的农产

品均有二维码追溯标签，成为全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监管工作的一个亮点，面向社会公众，展示文明惠州、诚信农业的风采，得到了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省政协副主席温兰子等领导的高度认可。“追溯平台”也倍受各地市农业部门、参展企业的高度关注，展现了惠州市在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的新举措、新成就。

（二）有效促进了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实施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益。

惠州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全市已有农业龙头企业 270 家、农民合作社 2100 家，其中进入国家级和省级示范合作社 24 家和 112 家。一部分企业和合作社入驻“追溯平台”后，虽然在溯源码印制和产品包装等方面增加了一些成本，但企业和农民合作社普遍反映，增强了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标贴有溯源码产品都有详细的生产记录、批次信息，使企业内部生产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更加健全和严格，产品质量安全有了坚实的保证。加上产业链延伸，由于产品溯源码接入移动电子商务，消费者在查询产品溯源信息的同时，可以查到周边的产品销售实体店、网购链接等信息，消费者可轻松下单购买，进而提高了企业产品的优质优价和品牌效应，产品销量也明显增加。龙门县顺喜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平台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反映，入驻平台后公司的产品销量无论是终端门店还是在电商平台，都有大幅度提高。

（三）农业主管部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有了很好的“抓手”，创新了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手段。

在“追溯平台”建设中，农业主管部门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建立了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大数据库，1100 多家农业企业信息入库。已基本满足市、县（区）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的监管工作需要。通过业务权限实现对本辖区企业的监管，包括对种植、畜牧、加工等三种不同类型企业的基础信息、生产记录、企业和产品认证、企业信用等级、检验检测、信息沟通等信息管理；并对三品一标数量、龙头企业、检测样品等重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政府部门提供直观的数据查询平台。

二是建立了农产品检测业务管理数据中心，为农产品溯源安全保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实现蔬菜、水果、谷物、畜禽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业务，包含从样品的收取、传递、检验任务的分配、接收、检验结果登记、原始记录的自动分析计算、结果的校核、审核，报告的生成、审批、签发全过程的计算机自动化处理，并且提供快捷方便的信息查询、统计分析报表功能。

三是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行业协会提供了规范内部管理的信息系统，规范了农业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记录、档案管理，与“信用惠州”数据实时同步，为惠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目前已有 1073 家企业和合作社纳信用平台进行常态化监管，并开展对散户、时令农产品专项抽检和整治，散户监管模式已成为广东省典型。2016 年全市抽检蔬菜样品 14.08 万个，有效检测数据 63.7 万条，合格率 99.66%，并捣毁残留农药超样标 742 公斤。

三、探索“追溯平台”建设的做法和几点启示

（一）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追溯体系是个系统工程，要从实际出发，确定项目设计的主要内容。

要着力探索构建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体系，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涉及到多个经营主体、多个环节、多个部门，是个系统工程。项目设计目标是：“生产模式标准化，生产过程有记录，产品流向可跟踪，储运信息能查询，质量问题可追溯的全程管理体系”，从实践情况看，是符合实际、有可操作性和实效的。

这个体系建设的内容，从试点情况看，可概括为“一个平台、二级管理、三层监测、四个重点环节、五项制度”：

一个平台：质量安全管理全程追溯服务平台；

二级管理：市级和县区级；

三层监测：第一层次是生产基地单位的自检；第二层次是市级和县级质量监测；第三层次是流通环节的抽检、巡检。

四个重点环节：一是种植和养殖生产环节；二是加工环节：包括分级整理、包装、仓储；三是流通环节：包括储运和销售；四是分销环节：包括批发和零售。

五项制度：生产标准化制度、产地产品准出制度、销地准入制度、产品质量追溯流程制度、监管决策数字化制度。

（二）科学合理设计追溯码标签在诸多环节的使用流程。

由于农产品品种、规格的多样性，门类多、产业链长，对追溯源标签的大小、样式、制作工艺等有着不同的具体需求，种植、畜禽、水产品、加工农产品及农资的追溯信息也不尽相同，要深入研究一套涵盖追溯码标签的内容设计、样式规范、制作工艺、机器贴标等环节的追溯码标准体系，使用方法，以能够满足不同行业和产品、不同环节的追溯码使用流程。

（三）以产品和产业的合作和联合作为纽带，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是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追溯体系重要的组织基础。

要努力根据中央部署的“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和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精神，认真培育发展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近两年惠州市在项目平台建设中，非常重视培育发展农民合作社和产业化龙头企业，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作用，采用“行业协会+企业（合作社）”的管理服务模式，建设了一批果品、蔬菜等行业协会管理服务平台，将包括信息管理、会员企业管理、会员企业服务、追溯码申请和分配使用等功能，都由行业协会统一对企业请进行组织和管理。由于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极推动了二维码标签的组织推广、应用落地和顺利使用，优化了追溯标签使用管理，并促进了企业和农民合作社节约成本，达到了灵活、高效使用标签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四）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运作模式，是符合实际和有效的。

创建“追溯平台”，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农产品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追溯监管体系，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性质。惠州市“追溯平台”的建设，是在惠州市农业局组织指导下，由惠州市

农业信息中心和惠州市易道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参与研发的应用服务平台，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运作模式，这是平台建设顺利展开和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组织保障。

惠州市“追溯平台”的建设已有良好开端，最近通过年底总结，准备在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使这种运作模式继续深化和完善。下一步工作设想主要是：

1、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监管和追溯体系的核心内容。一是继续推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和品牌化经营水平，夯实溯源体系的基础。二是着力培育农民合作社和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示范合作社规范管理建设，提高经营服务能力，增强农业组织化程度，使分散经营农户形成规模经营和企业化经营水平。这是溯源体系重要的组织基础。三是完善追溯平台的规范管理，探索建立奖惩机制，提高追溯体系食品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2、进一步完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和终端消费等环节的衔接，形成食品安全监管全程链条。根据惠州市农业局建设规划，项目分三个阶段建设，下一步工作重点要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体系，溯源对象从食用农产品延伸到种子种苗、农用物资，实现农业生产投入品源头可追溯、过程可追踪。进一步打通追溯体系涉及的农产品检测、农产品认证、企业认证和项目管理等数据链条，同时，将追溯作为农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抓手。落实制定相关奖惩机制，对农业生产销售中出现违法行为且伪造追溯信息的企业要依法予以必要惩处，对产品追溯应用和推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在项目资金上予以扶持。

3、探索追溯平台的持续发展机制，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活力。继续完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参与”的发展机制，促进平台持续运营、管理、应用和推广。创新财政资金使用办法，由政府扶持向购买社会服务转变，由具备一定实力、技术和资质的社会服务型企业承担平台的运营和推广工作。2017年，惠州市农业局将重点做好溯源平台的宣传推广工作，将龙头企业、合作社示范社作为平台第二批试点应用企业，追溯产品覆盖到“三品一标”、名牌产品，并打造若干家集宣传、培训和展示为一体的市级追溯示范单位，面向社会公众和同行企业开放，进行追溯体验和交流学习。完善平台多功能的配套服务，拓展技术培训、电子商务、农资供应、农超对接、农校对接等多种服务，让参与主体能互利共赢，形成有活力、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作者：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中管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特聘专家。本文写于2017年2月15日）

施平老人家给我的一封信

蒋谐音

编者按：这是106岁高龄施平同志给农业部退休干部蒋谐音、在得知她的丈夫张聚先去世消息后写的回信。

施平同志在上世纪 50 年代，曾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张是他的学生，毕业于 1953 年。从短短的一封亲笔文中，论及从爱因斯坦的人生哲学到自己，以及对她的告慰，可以看出作为一名久经考验、战斗不息的老一辈共产党员，至为崇高的思想境界以及对学生的厚发与教诲，令人十分感动，成为大家永远学习的榜样。施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后，热爱摄影，以中外多种秀丽异彩珍贵的花卉品种为对象，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编印成多部《施平摄影集》，成为把鲜花的自然美与内在的心灵美融为一体的作品，甚为珍贵，令人仰慕。在 2016 年 11 月 1 日的 106 岁生日之时，他的学生已成为现任的党委书记向他祝寿，自然使人产生“桃李满天下”之感。在今年 1 月寒冬时，还亲往上海广场，拍下了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头像。衷心祝愿这位“健康老寿星”，创造健康长寿新的奇迹。

在施平同志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时，我毕业留校。曾先后担任苏联老专家澳干诺夫与布拉英拉维兹任校长顾问的翻译，在施校长直接领导之下工作，耳濡目染，深受教育，留下许多使人终身难忘事例。在施校长离开农大赴上海工作后，还保持联系。特别是在离休后，每逢春节他要寄来自拍摄并签名的花卉照片的贺年片，特意将多部《施平摄影集》寄给我留作纪念。今年 1 月，我的丈夫张聚先去世后，我写信告诉了老人家，随即得到回信，说了意味深长十分感人肺腑之言，使我全家及同事们深受感动。现将这封信的全文送给《通讯》编辑部刊载。

附：施平同志给蒋谐音的信

谐音同志：

新年快乐。

来信收到，知道聚先同志逝世，我向他致以深沉悼念，并望你多多保重。生老病死是大自然法则，无可避免。现在科学物理知道，人和世界万物一样，是由很微小的宇宙粒子偶然组成，一定时候就会分解散去，另外组成各种存在。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死前，许多人希望把他的身体保留下来。他说希望将他的身体全部早日回归基本粒子，去组成各种存在。我的老伴蒋炜同志去年初九十一岁去世。我今年已 106 岁，回归基本粒子的时间也不远了。人是宇宙中千千万万星体中一个小小的星体（地球）上存在的物质，人人都是仙人，是了不起的。我们要好好享受它的时日。

祝你一切安康。祝你长寿！

施平

2017 年 2 月 11 日

浅谈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思维更新

孟焕民

“创新”，是当今官方言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型，产业质态亟待提升，僵化的结构必须打破，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创新。尤其是在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对苏州提出“创新四问”以后，苏州各级党委、政府都力求在创新问题上有所作为。

这一轮热议的创新重点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创新。在整个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政府权力是整个社会权力体系的中枢，政府具有调动资源、组织资源、整合资源的优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政府固然不是主体，但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和引领。

创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进入陌生领域，意味着改变和创造，意味着对原有知识和方法的突破。某种意义上讲，创新是带有革命性的，那么政府如何组织和引领创新活动同样是带有革命性的。

思维是行动的先导。面对带有革命性的创新活动，惯性思维是最大的敌人。政府要在组织和引领创新活动中精准发力，更新思维是第一位的。政府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倡导并日益强化以下三方面思维。

一、“高手在民间”思维

在一次全国人代会期间，李克强总理说了一句感慨的话：“高手在民间啊”。这句话再次印证了一条常识性的结论，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中央响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江苏省委号召“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都告诉我们，创新的源泉在民间。“人民创造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要组织和引导好创新活动，政府一定要强化“高手在民间”思维，把蕴藏在群众中的智慧和力量发掘来、释放出来。一要眼睛向下。改变眼睛向上的思维习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民间，坚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感受群众中的精神力量，发现民间鲜活生动的个体，注重对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创新实践的总结，凝聚创新之力。二要多做“解放人”“激励人”的事。一个伟大的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进行探索。要允许人们有梦想，鼓励奇思妙想，尊重人们对兴趣、爱好的选择，尊重人们的首创精神，尽量为个体展示力量、展示智慧提供机会。三要学会让渡权力。创新需要人才引领。实施人才引领就得让人才有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经济发展方面创新的人才引领，应该是企业家引领。经济方面的事情，企业家比专家更重要。一个地方的经济如何转型升级，题目应交给企业家，让企业家在宏观政策制订过程中有发言权，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参与权，在企业乃至行业转型升级路线方面有决策权。能不能有效地释放企业家的才能，是地方政府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二、“店小二”思维

“店小二”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称谓，它形象地表达了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职能服务。应该说，自从党的十八大明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后，人们对政府、市场功能边界划分有了重要的依据。

邓小平有句名言：领导就是服务。引伸这句话的含义，可以说加强领导就是加强服务。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政府还很不习惯“店小二”这个角色。行为是由思维决定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确立“店小二”思维即“服务”思维，那么在引导和组织创新活动中很容易沿用过去的习惯性套路，运动式推动，直接插手经济转型、号召创新、规划创新等，要扭转这种习惯性套路，必须遵循习近平提倡的“要像出家人那样，天天念阿弥陀佛，我们要天天念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在“店小二”思维引导下，政府服务于经济发展方面的创新主要产品是两个：一是搭建平台。包括建立创投中心，建立科技园，设立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作站等，为人们的创意提供交流的场所，为创意转化成产品提供适宜的条件，为创意产品走向市场提供渠道，为创意经济运行制定规矩。二是制订政策。政府的精准服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策体现出来的。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制定有关发展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应用、商业模式创新、大数据应用、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科技与金融结合等方面的政策，一定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量身定制，真正做到“微观政策要活”。

三、“链”思维

所谓“链”思维，就是整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思维方式。

前几年，我们经常遇到类似的发问，诸如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我们能不能出乔布斯？如果林书豪生活在中国能不能成为今天的林书豪？这些发问都指向一个概念环境。近年来，又发生了科学界与佛教界联合，从哲学的角度开展对“因果”关系的研讨，一致认为“因果”观是对的。有其“因”必生其“果”。同时指出，“因”与“果之转换不是直接的，中间还必须有“缘”。犹如一颗种子一定要经过发芽、成长、开花的阶段才能结果，而这过程中必须有土壤、阳光、水、空气、温度等诸多条件，这些条件就是“缘”。

应该说，创新就是个“链”。从创新的构想、创新的人才转化成创新的成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诸多环节构成的“链”，这些诸多环节就是“缘”，也可称之为“环境”，包括硬环境、软环境。因此，政府组织和引导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应体现在能不能系统性地思考问题，运用“链”思维解决问题。一方面应强调经济发展方面的创新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都相关，除与之有直接关联的经济、科技、人事、财税、金融等部门外，其它看似无关的部门都有责任，那就是共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另一方面多做强“链”方面的工作，打通某些不通环节，加强那些薄弱的环节。

（作者：江苏省苏州市农村经济研究会会长，本文转自《苏州农村通讯》2017年第1期）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各省农委（农业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卢继传 刘 坚

副 主 编：许小平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5015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部北办公区16号楼、18号楼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3楼/4楼

部门协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推广培训处 责任人：黄维东

主 编：胡兆荣

责任编辑：孙正恩 辛 梅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xyp1102@163.com



农业科学研究院



农业经济研究所